

学校代号 10532

学 号 S181601423

分 类 号

密 级 公开



硕士学位论文

汪伪政府对“大亚洲主义”的“诠释”

学位申请人姓名 严林健

培 养 单 位 岳麓书院

导师姓名及职称 余露副教授

学 科 专 业 中国史

研 究 方 向 中国近现代史

论文提交日期 2021 年 5 月 20 日

学校代号：10532

学 号：S181601423

密 级：公开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汪伪政府对“大亚洲主义”的“诠释”

学位申请人姓名：严林健

导师姓名及职称：余露副教授

培 养 单 位：岳麓书院

专 业 名 称：中国近现代史

论文提交日期：2021 年 5 月 20 日

论文答辩日期：2021 年 5 月 23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陈先初教授

Wang Puppet Governmen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Asianism"

by

YAN Linjian

B.E.(Xiangtan University)2018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History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Super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Yu Lu

May,2021

摘要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演讲，主旨是复兴亚洲文化、期望中日合作和反对帝国主义，而其还未对“大亚洲主义”作进一步的阐释，便于1925年3月溘然长逝。也正因为此，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具有独特的包容性和延展性，从而为后人的阐释和发挥提供了较大的余地。

抗战初期，日军迅速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一时间中国社会“亡国论”和“求和论”甚嚣尘上。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日本逐渐加强了“政治诱降”的力度。同年12月，汪精卫发表“艳电”以迎合“近卫三原则”，积极向日本靠拢。1940年3月，在日本的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汪伪政府。为了配合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需要，汪精卫利用和改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首先是将“三民主义”与“大亚洲主义”联系起来，并延伸了前者的适用范围，说“就中国来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就东亚来说，三民主义也就是大亚洲主义”；其次，他将“大亚洲主义”的范围延伸到民众自觉层面，说“没有民族主义，不能唤起中国民众的自觉；没有大亚洲主义，不能唤起东亚民众的自觉”；最后，他强调“大亚洲主义”是中日联合的纽带，并认为日本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因而要与日本一起实现“大亚洲主义”。经过汪精卫的“改造”，“大亚洲主义”在内涵和外延层面都为之大变。汪精卫还解释说“和平运动”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继承与实践，企图用“大亚洲主义”理论为自己的“和平运动”进行辩解，从而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配合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汪伪政府不断借用和改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声称“大东亚战争是对大亚洲主义的实践”，因此，中国必须支持日本，配合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在汪伪政府的不断阐释与改造下，“大亚洲主义”沦为“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的代名词。对此，国共两党基于提升全民族抗战的凝聚力的共同需要，均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而由于两党存在利益与立场的差异，其回击的重心和力度存在较大差别。

关键词：汪伪政府；大亚洲主义；孙中山

Abstract

In November 1924, Sun Yat-sen delivered his "Great Asianism" speech in Kobe, Japan, aimed at reviving Asian culture, hoping for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and opposing imperialism, but he died in March 1925 without further explanation of the "Great Asianism". For this reason, Sun Yat-sen's theory of "Great Asianism" is uniquely inclusive and malleable, thus providing greater space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interpret and pla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Japanese army quickly occupied a larg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At that time, the theories of "national subjugation" and "seeking peace" were rampant in Chinese society. With the fall of Wuhan and Guangzhou in October 1938, Japan gradually strengthened its efforts of "political inducement". In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Wang Ching-wei published "The Yan Telegram" to cater to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Konoe" and actively close to Japan. In March 1940, with the support of Japan, Wang Ching-wei established the Wang Puppet government in Nanj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Japan's construction of "New East-Asian Order", first of all, Wang Ching-wei connected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with "Great Asianism" and extende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former. He said that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re the doctrine of national salvation; as far as East Asia is concern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re also the Great Asianism". Secondly, he extended the scope of "Great Asianism" to the level of people's self-consciousness, said that "without Nationalism, we cannot arous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without Great Asianism,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East Asian people cannot be aroused". Finally, he stressed that "Great Asianism" was the link of Sino-Japanese union, and thought that Japan was "a nation that treats us equally", and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with Japan to realize "Great Asianism". After Wang Ching-wei's "transformation", "Great Asianism" has been greatly changed in both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Wang also explained that the "Peace Movement" was an inheritance and practice of Sun Yat-sen's "Great Asianism", tried to justify his "Peace Movement" with the theory of "The Great Asianism",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his own rul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 order to support Japan's "Great East Asian War", the Wang Puppet government constantly borrowed and reformed Sun Yat-sen's thought of "Great Asianism", claiming that "the Great East Asian War

was the practice of Great Asianism", therefore, China must support Japan in building a "Great East Asia Co-Prosperity Circle". Under the continu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uppet government of Wang, "The Great Asianism" became the synonym of "New East-Asian Order" and "Great East Asian Co-Prosperity Circle". To this end, based on the common need of enhancing the cohes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the whole natio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both fought back powerfully.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interests and position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focus and strength of their counter-attacks.

Key Words: Wang Puppet Government; The Great Asiaism; Sun Yat-sen

目 录

湖南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I
摘 要	II
Abstract	III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2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研究难点	11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12
第一章 汪伪政府成立前各方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	13
第一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观的基本内容	13
第二节 抗战前国民党和日本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	19
第三节 抗战初期汪精卫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及国共两党的驳斥 ..	27
第二章 汪伪政府成立后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	33
第一节 寻找“建国”的“合法性”依据	33
第二节 配合日本的舆论宣传	39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亚洲主义”进入实行阶段	45
第一节 “大亚洲主义”由理论阶段进入实行阶段	45
第二节 汪伪政府收回租界与废除不平等条约	48
结 语	52
参考文献	56
致 谢	60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作为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开创者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不仅在生前对近代中国有较大影响力，而且身后亦发挥着较大作用。其去世后，国民党通过一系列的“造神运动”，尊其为“国父”，使其名号逐渐升华为一种国家权力合法化的象征，一种法统和正统的标志符号。而孙中山的重要著作和论述，如《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和“大亚洲主义”，也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政治遗产，具有崇高的地位和重大的现实影响。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演讲的主旨是复兴亚洲文化、期望中日合作和反对帝国主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为了满足自身的政治和舆论宣传的需要，国民党、共产党和汪伪政权都对其进行了广泛的阐释。抗战开始前，汪精卫对“大亚洲主义”并没有给予关注，但随着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亡国论”和“求和论”一时甚嚣尘上，汪精卫由最开始的主战逐渐转向主和，也开始积极借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来为自己的“和平运动”摇旗呐喊。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逐渐加强“政治诱降”，各地伪政府相继建立，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要人物，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拥有很强的影响力，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极力拉拢和争取的对象。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近卫三原则”。1940年3月，在日本的支持和帮助下，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全民族抗战的士气。汪伪政府以“三民主义”和“大亚洲主义”思想作为自己建立政权的理论依据，但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中民族平等的前提不利于日本的侵华政策，也不利于日本控制伪政府。因此，对“大亚洲主义”思想加以改造和重新阐述，使之适合“新政权”的需要遂成为当务之急。汪精卫认为“就中国来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就东亚来说，三民主义也就是大亚洲主义”^①。有观点认为，他把谋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改造成只反对西方侵略而不反对日本的“中日亲善论”，把民权主义改造成只宣扬“中心势力”和“汪精卫主义”，把民生主义改造为追求中日合作和“经济提

^①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三民周刊》1940年第2卷第1期，第45页。

携”^①，被改造之后的“三民主义”和“大亚洲主义”相互配合，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以满足汪伪政府的统治需要和日本政府对外侵略“合理化”的需要。对孙中山名号的争夺，实质上是争法统、争正统。汪精卫为了标榜他是孙中山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和寻求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依据，自然不会忽视对孙中山思想和名号的尊崇与利用，如通过各种各样的纪念仪式和法律条文来塑造孙中山的“国父”形象，通过重新建构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以迎合和美化日本的侵华政策。

为了证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汪伪政府重新“阐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宣传“中日亲善”。为了进一步宣传和利用“大亚洲主义”，汪伪政府还组织出版了《政治月刊》、《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新东方杂志》、《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大东亚》等杂志，积极向民众进行舆论宣传。通过对这六种杂志内容的研究与分析，可以发现汪伪政府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以此作为其建立政权的理论依据，并且与日本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相互配合，不仅满足其“和平建国”的政治需要，还迎合了日本对华侵略的宣传需要。

汪伪政府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宣传，对研究汪伪政府的孙中山纪念有着重要意义。而关于汪伪政府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利用和影响，以及汪伪政府如何借用“大亚洲主义”以宣扬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宣传，目前研究相对较少。具体而言，汪伪政府是如何借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其宣传的“大亚洲主义”的影响；其宣传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对外侵略时先后提出的“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是什么关系，是如何配合的，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更加细致的研究。研究汪伪政府如何利用和阐释“大亚洲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认识汪伪政府，也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孙中山纪念史的研究。尽管汪伪政府改造和利用“大亚洲主义”是为了服务其政治需要，但其宣传和改造是抗战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第二节 研究现状

汪伪政权虽存在时间较短，仅有短短 5 年多，但可供研究和探索的领域仍然不少。目前学术界对于汪伪政权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部分，一是对汪伪政府主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如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等，

^① 雷黛鸽：《汪伪政权的三民主义论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二是主要集中在经济财政、“新国民运动”、“和平反共建国”运动、“清乡”运动、汪精卫叛逃原因以及汪伪政权的特点和本质等方面，其研究的角度和内容各有侧重，逐渐呈现集中之势，而关于汪伪政府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阐释，关于“大亚洲主义”在汪伪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汪伪政府如何借用“大亚洲主义”以宣扬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宣传，目前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也较为简略。有关“大亚洲主义”的资料主要有方济生所著的《大亚细亚主义之研究》，该书分为大亚细亚主义之研究、时事问答等部分，并宣传孙中山的遗教^①。张鲁山所著的《大亚细亚主义导论》宣传亚洲有色人种的“团结”，鼓吹“中日合作”^②。陆起所著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真谛》分析了大亚细亚主义的由来及理论基础，批驳了投降派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歪曲，指出日本所主张的“东亚新秩序”的实质是为了独霸亚洲^③。

1940年，周化人所著的《大亚洲主义纲要》和《大亚洲主义论》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汪伪政府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观点和看法。《大亚洲主义纲要》主要认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原理是三民主义，而指导亚洲革命的宝典则是大亚洲主义”，并进一步延伸为“亚洲主义大既然是亚洲革命的指导原理，也就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指导原理”，书中还有多篇关于“东亚联盟”的文章，强调在“大亚洲主义”旗帜下开展“东亚联盟”运动，这对于中国实现独立和中日合作十分重要，从而把“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东亚新秩序”和“东亚联盟”联系起来，以配合汪伪和日本的舆论宣传需要^④。而《大亚洲主义论》主要认为“实现大亚洲主义的先决问题，是求亚洲最大之中国的独立自由，以充实其复兴亚洲之原动力”，同时还认为“大亚洲主义能解决亚洲民族问题，实现中日永久和平”，由此可知，汪伪政府阐释的“大亚洲主义”主要是为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宣传，从而既适应了汪伪政府“和平建国论”的需要，又满足了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需要^⑤。这两部著作是研究汪伪政府宣传“大亚洲主义”的重要资料，颇有史料价值。此外，杨鸿烈的《大亚洲主义》一书出版，该书共分为8讲，主要讲述大亚洲主义的定义，大亚洲主义与“民族主义”、“东亚新秩序”、“远东门罗主义”的区别等，宣传以“王道”文化来抵制欧美的侵略^⑥。1981年，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

^① 方济生：《大亚细亚主义之研究》，北京：东方问题研究会第一支部，1937年。

^② 张鲁山：《大亚细亚主义导论》，出版地和出版社不详，1939年。

^③ 陆起：《大亚细亚主义的真谛》，上海：正言出版社，1941年。

^④ 周化人：《大亚洲主义纲要》，南京：大亚洲主义月刊社，1940年。

^⑤ 周化人：《大亚洲主义论》，南京：大亚洲主义月刊社，1940年。

^⑥ 杨鸿烈：《大亚洲主义》，出版地、出版社和出版时间不详。

研室编的《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①，整理了汪伪政府的相关资料，其中涉及很多汪精卫集团阐述“大亚洲主义”的文章，虽不完整，但意义较大。余子道、黄美真 1984 年开始汇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丛书，他们搜集了当时的报刊杂志、汪伪政权档案、当事者回忆录等众多史料，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这部丛书首次较为全面地搜集了日本政府内阁和军部档案史料，填补了日文史料的空白，为研究汪伪政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史料，这部丛书对于研究“大亚洲主义”颇有价值。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一些相关研究逐步展开。本文的学术史回顾主要从以下两个部分展开：（一）关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研究情况；（二）关于汪伪政府宣传“大亚洲主义”的研究情况。具体的研究成果整理如下：

（一）关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研究情况

关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1982 年 12 月，蒋翰廷、赵矢元通过归纳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基本要点，深入分析其演讲时的世界局势和中日关系，不仅指出孙中山的目的是“呼吁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还认为孙中山在进行“大亚洲主义”演讲时，早已从“联日”的幻想中摆脱出来，开始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提醒日本政府不要与西方列强狼狈为奸，但仍期望日本民众支持中国革命，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亚洲主义”^②。1984 年，赵矢元认为孙中山不是大亚洲主义者，他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其基本思想是“反对日本侵略亚洲、独霸亚洲”^③。这两篇论文对于笔者了解和认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有一定的帮助。1985 年，日本人山口一郎指出，孙中山在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之前，曾派李烈钧前往日本，呼吁和日本一起建立“亚洲大同盟”，而孙中山派遣李烈钧去日本的背景是日本正在反对美国通过的《排日移民法案》，并鼓吹亚洲民族团结的“大亚洲主义”。还指出了李大钊和孙中山都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批判，认为应该用“新亚洲主义”或“大亚洲主义”来取代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④，该文有利于笔者了解“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背景。接着，日本人野泽丰简单介绍了日本国内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相关研究情况，

^①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 年。

^② 蒋翰廷、赵矢元：《略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东北师大学报》，1982 年第 6 期。

^③ 赵矢元：《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选自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中日关系史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④ [日]山口一郎：《孙文的“大亚洲主义”和“亚洲大同盟”》，选自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 3 集，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85 年。

首先指出藤井昇三认为“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最大目的，在于取得日本国民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要求的理解与支援”，并指出日本国内最近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批判藤井昇三观点的基础之上，紧接着强调研究“大亚洲主义”应把孙中山的《北上宣言》与“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一贯性、李烈钧访日以及当时中国各派对日本的态度和留日华侨及学生对日本的态度等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还强调要积极对照查看中日双方的资料，该文对于笔者了解日本国内研究“大亚洲主义”的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①。1986年，陈锡祺通过回顾孙中山的革命历程，既阐明了他对“中日友好”的一贯主张，又勾勒出其对日认识的演变脉络，并结合其赴日本之前的反帝宣传与言论，推导出，孙中山在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时，他的反帝立场就十分坚定，并未对日本政府抱有幻想^②。该文对孙中山对日思想演变的分析和阐述，对于笔者认识和分析“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背景具有较大参考价值。接着，黄德发提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其主旨是“联合亚洲各国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③，因而可以视作亚洲被压迫民族人民共同意愿的反映。1988年，赵军指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承袭日本“大亚洲主义”者的基本主张，表达反侵略的思想，第二阶段则跳出日本“大亚洲主义”思想的束缚，用新三民主义对之进行了彻底改造，使之成为直接反映中国以及亚洲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舆论工具，因而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外活动方面的积极探索^④。

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亚洲主义”的研究角度不断扩展，成果也更加丰富。陈锡祺认为孙中山的亚洲观有以下几点：一是孙中山对亚洲复兴充满信心。二是孙中山认为振兴亚洲是亚洲人自身的责任，要抵制欧美的侵略，实现亚洲的独立。三是孙中山认为复兴中国是复兴亚洲的第一步。四是孙中山十分重视“中日合作”。还认为孙中山的亚洲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斗争中不断丰富的^⑤。该文对孙中山的亚洲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有益于笔者深化对孙中山亚洲观的认识。李台京所著的《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研究：历史回顾与当代意义》叙述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提出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基本内涵与发展演变，阐明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践，并修正了部

^① [日]野泽丰：《关于孙文在北上途中所发表之言论——以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讲演为中心》，《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② 陈锡祺：《孙中山与日本》，《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③ 黄德发：《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问题平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④ 赵军：《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

^⑤ 陈锡祺：《孙中山亚洲观论纲》，《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分美、日学者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观点^①。1993年，段云章认为孙中山的对日观既不是简单的由依靠到批判，也不是简单的由联合到反帝，而是联合和批判在曲折中来回反复，指出孙中山强调中日亲善必须基于平等原则，寄希望于日本政府援助中国，但最终希望落空，最后还认为孙中山直到去世时，仍对日本抱有幻想^②。1995年，高纲博文通过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历史背景考察，在对其讲演意图的解释上，鲜明地提出了“日中苏合作论”的观点，在已往的“反帝国主义”和“中日合作”的解释框架上有了较大突破^③。周兴樑则认为孙中山虽然借用过“大亚洲主义”之类的词语来表达其复兴亚洲的思想，但“我们不能依此而论断他是提倡大亚洲主义的大亚洲主义者”^④。接着，吴剑杰指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虽然在初期受到了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影响，但其主要观点是在各国革命者相互支持、合作的过程中最终形成的，因而带有国际主义的性质^⑤。1996年，俞辛焞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出版，该书是一部全面论述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详细阐述了1894到1925年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叙述了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建立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下篇就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分析和考证了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及其原因，并评析了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对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意义^⑥。该书有利于笔者深入了解孙中山与日本的复杂关系。1999年，吴仪认为“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还认为“大亚洲主义”具有发展国际区域主义的时代性与实用性的价值^⑦。该文强调“大亚洲主义”的时代意义，但对“大亚洲主义”内容和思想渊源的分析，有助于加深笔者对“大亚洲主义”的理解。

进入21世纪，“大亚洲主义”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2002年，张军民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和日本宣传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了对比，认为它们虽然在“亚洲联盟”论、“中日连携”思想等上有相似之处，但孙中山强烈反对日本的侵略主义^⑧。2004年，林家有和李明所编的《孙中山与世界》一书出版，该书收录了桑兵的《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

^① 李台京：《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研究：历史回顾与当代意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② 段云章：《1923年后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③ 高纲博文：《孙中山的日中苏合作论的历史背景》，《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年第5期。

^④ 周兴樑：《孙中山复兴亚洲思想略论》，《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年第5期。

^⑤ 吴剑杰：《从大亚洲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略论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⑥ 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⑦ 吴仪：《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时代意义》，《“孙中山北伐与梧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

^⑧ 张军民：《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学术研究》，2002年第10期。

和藤井昇三的《论 1924 年孙文访日》等论文。桑兵在论文中认为，强国取向、中国主体意识、反对强权霸道的王道观和同情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是孙中山国际观与亚洲观的四大支柱，还指出孙中山坚决反对列强的侵略，主张取得独立的强国应实行王道政策，承担援助亚洲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义务。藤井昇三在论文中指出，孙中山在访日之前，曾派特使李烈钧赴日，并着重分析了 1924 年孙中山访日和日本方面的舆论，作者认为孙中山访日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争取日本国民的支持，但日本舆论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并未给予足够重视^①。该书对于笔者认识孙中山的亚洲观和“大亚洲主义”演讲在日本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2005 年，任浩认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旨在称霸亚洲，而孙中山的大亚洲思想旨在反对帝国主义，谋求亚洲各民族的自由与平等，两者完全不同。他还对孙中山的大亚洲思想产生的原因、内涵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并评价道孙中山在早期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缺乏深入的认知，且因为孙中山过早逝世，未能来得及对大亚洲思想做系统的阐释，其大亚洲思想最终被不怀好意之人恶意歪曲，但内容相对简略^②。而李本义相对全面的分析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历史根源，并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其内容，还分析和总结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和演变过程，并指出其有较大的历史意义，对于本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③。2006 年 11 月，桑兵指出，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原因，前人大多认为是孙中山自身思想发展变化的结果，却忽视了 1924 年美国排日移民法案的影响。排日移民法案全面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的抗议，日本社会掀起了“重回亚洲”的思潮。在此背景下，孙中山为了实现国内统一，积极寻求日本政府的援助，但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孙中山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日本国民，以求争取日本国民的支持^④。因此，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思想，不是为了迎合日本政府的需要，而是为了争取日本国民的支持。2015 年 1 月，桑兵认为，首先得考订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稿的版本问题，再注意孙中山对日本的政治主张的整体性和对日言论行事的连贯性，这是以前研究未曾涉及的^⑤。这是以往认识中往往忽视的，值得借鉴。接着，陈鹏飞认为，中日亚洲主义思潮都以“兴亚”、“联亚”为基本理论，即主张亚洲

^① 林家有、李明编：《孙中山与世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② 任浩：《孙中山的大亚洲思想》，《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

^③ 李本义：《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江汉论坛》，2005 年第 11 期。

^④ 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6 期。

^⑤ 桑兵：《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社会科学研究》，2015 年第 1 期。

各国要团结起来，抵抗侵略，但两者在本质上则完全不同，日本强调以“亚洲联合”为幌子实施其“侵亚”和“吞亚”的图谋，而孙中山提倡“大亚洲主义”，主张亚洲各国在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一起奋斗，反对帝国主义^①。该文有利于笔者梳理和深化对中日两国亚洲主义思潮的认识。2019年，村田雄二郎不仅追溯了“后孙中山时期”中国亚洲主义的发展过程，还较大篇幅地讨论与亚洲主义互为表里的王道论的性质问题，最终指出，孙中山及其后继者都把亚洲主义与王道联系起来，推崇王道文化，抵制西方的霸道文化^②。而盛邦和所著的《亚洲认识：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学研究》分析了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情况和日本学者对亚细亚主义的研究，还探讨了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思想，如章太炎的“亚洲和亲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和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有利于加深笔者对日本“亚细亚主义”与中国亚洲主义的认识^③。

总体上来说，国内外学术界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十分重视的，对“大亚洲主义”研究的主题和视角也不断扩展，从研究“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背景到演讲稿不同版本的对照和孙中山的对日主张以及亚洲主义与王道论的联系等等，推动着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研究不断深化，加深了学界对中日两国亚洲主义思想的认识。

（二）关于汪伪政府宣传“大亚洲主义”的研究情况

1984年，石源华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是他们卖国投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联盟”运动与“大亚洲主义”相配合，鼓吹“中日联盟”和“东亚解放”，不仅适应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还毒害了沦陷区民众的精神^④。该文对于“东亚联盟”运动和“大亚洲主义”的论述，有利于深化笔者对“大亚洲主义”的认识。1986年2月，李勤指出，汪精卫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找到建立政权的“合理性”依据，积极借用和改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鼓吹他的“和平建国运动”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扬，目的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和平救国”的遗愿，以此来颠倒黑白，欺骗民众，为他的“和平运动”做辩护。但事实上，汪精卫利用和改造“大亚洲主义”

^① 陈鹏飞：《中日两国亚洲主义思潮的主流学派之比较》，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② 村田雄二郎著、宋舒扬译：《孙中山之后的大亚洲主义：民国时期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③ 盛邦和：《亚洲认识：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④ 石源华：《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

是为了配合日本的“近卫三原则”，在“和平反共建国”的理论下，却做着卖国投敌的活动，打着“和平救国”幌子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卖国投敌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投降主义理论^①。该文虽对“大亚洲主义”论述不多，但对于笔者了解“和平反共建国”理论有一定的帮助。1992年4月，张翠娥和孙石煌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集团对“大亚洲主义”进行了歪曲和篡改，造成了人们的误解，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就是期望中日合作，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联盟”，并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幻想。因而作者指出要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提出的背景和目的进行分析，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同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所讲的“大亚洲主义”进行分析、比较，以辩明真伪，从而得出公正合理的结论^②。这对于本文研究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提出的背景及正确辨别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歪曲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1994年1月，张学俊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的一系列反共投降活动并非偶然，它是在其民族投降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作者认为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理论主要由“大亚洲主义”、“伪三民主义”和“和平反共建国”理论三部分组成^③。虽然该文对“大亚洲主义”思想的研究并不深入，但对于笔者认识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95年4月，史潮指出，抗战时期汪伪政府的卖国投敌活动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从倡导“和平运动”发展到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发展到“黄色人种革命”。汪伪政府的“黄色人种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欺骗性；二是配合“东亚联盟”思想^④。文章指出了汪伪政府卖国投敌理论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是以往学界未能注意到的，对于本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1998年3月，韩国人裴京汉认为，汪精卫集团为了确保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大量利用和改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来作为他们的思想理论基础，积极向民众进

^① 李勤：《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即卖国主义》，《大连轻工业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② 张翠娥、孙石煌：《试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③ 张学俊：《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理论》，《唐都学刊》，1994年第1期。

^④ 史潮：《试论汪精卫集团投降主义理论之发展》，《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行舆论宣传。通过对这些宣传的研究与分析，可以得知汪精卫集团利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以此作为使其建立政权与“和平运动”得以“合理合法化”的手段，并通过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大亚洲主义”思想等同起来，同时与日本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相互配合，从而既适应了汪伪政府“和平建国论”的需要，又满足了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需要^①。这篇论文对研究汪伪政权的“大亚洲主义”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王屏所著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分析了日本亚细亚主义诞生、发展、实践和消亡的全过程，并探讨了日本亚细亚主义与“东亚协同体论”、“东亚联盟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的联系，批判了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②。

2005年，张军民的《对接与冲突：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出版，该书第二章“东亚联盟”舆论声中的大亚洲主义，重点分析和阐述了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兴起与孙中山对“亚洲联盟”论和“中日提携”观的回应，同时还探讨了“东亚联盟”与“大亚洲主义”的关系，日伪宣传“王道文化”是“东亚联盟”的文化根柢，并借“文化沟通”来掩饰“大陆政策”侵略的罪恶，迎合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③。该书对于笔者认识和分析“东亚联盟”与“大亚洲主义”的关系大有裨益。2007年，谢晓鹏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开展“新国民运动”的目的是以精神总动员来助力大东亚战争，来实践“大亚洲主义”，实质是一场“思想清乡”运动。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并配合“清乡运动”和日本的“大东亚战争”^④。该文有利于笔者了解到“新国民运动”与“大东亚战争”是对“大亚洲主义”的实践。2008年，张殿兴指出，抗战时期汪伪政权与其他傀儡政权相比，它不仅组织机构完整，更有一套较为全面的思想体系，同时严厉批评了汪精卫打着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幌子，为自己的卖国投敌行为做辩护^⑤。该文对笔者认识“大亚洲主义”有一定的帮助。2017年，李晓晨在博士论文《〈东亚联盟〉杂志研究》的第二章第四节中，简要谈到了《东亚联盟》下的“亚洲观”，不仅论述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还简要分析了汪伪政权宣传的“大亚洲主义”，认为日伪势力宣传“东亚联盟”论和改造“大亚洲主义”是为了鼓吹建

^① [韩]裴京汉：《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②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③ 张军民：《对接与冲突：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④ 谢晓鹏：《汪伪的“新国民运动”探析》，《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⑤ 张殿兴：《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①。该文虽然对“大亚洲主义”的论述比较简略，但有利于加深笔者对“东亚联盟”论的认识。2018年，王俏蕊在博士论文《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的第三章第二节中，简要涉及了汪伪势力对“大亚洲主义”的歪曲，认为主张中日合作虽然是孙中山的重要思想，但它不是孙中山对日主张的唯一内容，而汪伪政府为了配合“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需要，积极歪曲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还宣传所谓的“全体主义”和“东亚文化复兴”以维护在沦陷区的傀儡统治^②。该文对“全体主义”和“东亚文化复兴”的论述，有利于深化笔者对汪伪宣传的“大亚洲主义”的认识。

总体来说，学界对汪伪政府宣传“大亚洲主义”的研究由最开始的直接定义为是卖国投敌的活动到后来不断扩充研究视角，以更加全面的态度进行研究，通过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等等联系起来，推动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本文的写作也大有裨益。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研究难点

（一）研究思路

（1）分析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产生背景、政治影响，追根溯源，还原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本意与时代背景及适用语境，梳理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各派对“大亚洲主义”的不同阐述，并厘清这些阐述的区别与侧重。

（2）以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发表的有关“大亚洲主义”的文章与演说等资料为依托，阐述汪伪政府“大亚洲主义”的基本观点，探讨汪伪政府如何在“大亚洲主义”的旗号下对其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的。

（3）通过比较汪伪政府宣传的“大亚洲主义”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内容，分析其中的区别，探究以上区别产生的原因，并通过分析国共两党对汪伪政权这一理论的反击和回应，探究汪伪政府宣传和利用“大亚洲主义”的真实目的。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梳理孙中山生前身后国内外人士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理清其变化脉络，并结合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分析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阐明这些变化的背景、意义和效果，以求更加全面的认识“大亚洲

^① 李晓晨：《〈东亚联盟〉杂志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② 王俏蕊：《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主义”。本文利用的史料主要有《申报》、《政治月刊》、《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等等，研究汪伪政府如何利用和阐释“大亚洲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认识汪伪政府和“大亚洲主义”。

（三）研究难点

（1）如何准确凝练的梳理“大亚洲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不同变化，并且比较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难点所在。

（2）汪伪政府对“大亚洲主义”的利用和改造，与当时的政治需求、日本的侵华政策、整个战争的态势变化及国际环境等息息相关，在不同时期的需求和侧重点都有所不同，如何准确凝练的呈现出这种动态化过程是需要解决的难点。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本文创新之处有三点：一是对汪伪政府研究领域的拓展。目前学术界关于汪伪政府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阐释和研究，关于“大亚洲主义”在汪伪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汪精卫是如何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宣传，目前研究相对较少，尚不能有系统、全面的解读。汪伪政府是如何通过宣传“大亚洲主义”来纪念孙中山的，对这一过程的探究，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汪伪政府的研究。二是进一步丰富孙中山纪念史的研究。学界对孙中山纪念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以汪伪政府为切入点的较少，研究汪伪政府对孙中山的纪念，有利于充实孙中山纪念史的研究。三是进一步丰富抗战时期思想文化宣传的研究。汪伪政府对孙中山的纪念，汪伪政府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阐释和“大亚洲主义”在汪伪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汪伪政府是如何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宣传等等，这些都是抗战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于两处，一是史料搜集的相对不足，在个别重要阶段仍旧不能充分阐释汪伪政府政策策略形成的幕后原因，也不能充分描述其对某些重大事件认识和处置的经过情形，并缺乏对日文资料的运用。二是限于笔者水平，对已搜集的史料未能充分解读，缺乏细致的探讨，许多分析流于表面，不够深入。

第一章 汪伪政府成立前各方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于11月28日在日本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而1924年5月美国通过“排日移民法案”，这一法案全面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在日本社会激起了强烈的“重回亚洲”反应，在这样的背景下，神户商业会议所把演讲题目指定为“大亚洲主义”，但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的口号，最早见于他1917年写的《中国存亡问题》。在“大亚洲主义”讲演中，孙中山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大亚洲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逐渐加强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如戴季陶、胡汉民和汪精卫等都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和阐释，以表明他们对日本的态度，因此有必要回归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文本和时代背景，追根溯源以求正本清源。

第一节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观的基本内容

（一）复兴亚洲文化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对“大亚洲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他说：“我们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像希腊、罗马那些古国的文化，都是从亚洲传过去的。我们亚洲从前有哲学的文化、宗教的文化、伦理的文化和工业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亘古以来在世界上很有名的”。他高度赞扬亚洲文化，认为亚洲文化在以前是很先进、很有名的文化。只是到近代以来，亚洲文化才逐渐落后了。而欧洲国家强盛之后，四处对外侵略扩张，以欧洲文明为中心，在全世界推行欧洲文化，侵略亚洲国家，导致亚洲很多国家都变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孙中山对亚洲国家沦为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对亚洲文化的极度衰弱是十分痛心的。

但绝处逢生，孙中山说：“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全亚洲民族复兴的一天”^①，是亚洲复兴的起点，特别是日本击败沙俄之

^①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1-402页。

后，使亚洲受压迫的民族看到了希望，鼓舞着亚洲其他国家“做种种独立运动……要做亚洲的主人翁”，还要恢复我们亚洲从前的地位，要复兴亚洲。“我们讲大亚洲主义……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由此可知，“大亚洲主义”是研究文化问题，研究东西方文化的本质与区别，而这种东方文化最适合的解释就是“精神文明”，正和“物质文明”一词相对应。紧接着孙中山指出了东西方文化的特征和不同，他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孙中山认为西方文化是功利的，能得一时之利，却不能长久，而东方文化是以王道为基础的，虽偶有衰弱，但能长久感化人，而且以王道文化为基础，就算衰弱，也能在短时间内重新强盛起来，所以他说“只用仁义道德做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力”，还说“近来也有被我们感化了的……这便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于光明”^①。由此可知，孙中山对亚洲的王道文化充满信心，认为复兴亚洲文化能使世界文化的发展更光明。复兴亚洲文化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切入点，旨在点明中日一衣带水、文化相同，同属于亚洲文明的一份子，理应相互扶持、守望相助。孙中山通过宣扬亚洲文化复兴，希望唤起日本民众的亚洲共感，以帮助中国实现统一与独立。

（二）期望中日合作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观的提出，有一个过程。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还缺乏足够认识，认为中日两国“本出同种同根，决无相异之理也”^②。1917年11月，孙中山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指出，“夫中国与日本，以亚洲主义，开发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国亦以其门罗主义，统合太平洋以东之势力，各遂其生长……以此三国之协力，销兵解仇，谋世界永久之和平”^③，从而将“亚洲主义”与美国的“门罗主义”联系起来，认为中日美三国分别以“亚洲主义”和“门罗主义”开发和统合太平洋之资源与势力，有利于实现世界永久和

^①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2、407、407、409页。

^② 孙中山：《在大阪欢迎会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

^③ 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4页。

平，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较为明确的提出“亚洲主义”的口号，并对日本抱有很大的幻想。但1915年，随着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孙中山不断认识到日本政府的侵略野心。1919年6月，孙中山在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时说，“日本对德宣战，于攻克青岛之时，则对列强宣言以青岛还我。乃于我参加欧战之日，则反与列强缔结密约，要以承继德国在山东之权利……中国此回所以痛恨日本深入骨髓者，即在此等之行为也”^①，孙中山痛斥了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而1923年11月，孙中山在《致犬养毅书》中说，“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②，由此可知，孙中山还是希望日本能帮助亚洲，而不要步欧美侵略亚洲的后尘。从1917年到1924年，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从最开始尚未深刻认识到日本政府的侵略野心转变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做出了较大警惕，但考虑到日本实力强大，而中国实力较弱等原因，孙中山仍对日本抱有期待，期望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所以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对“大亚洲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期望在“大亚洲主义”旗帜下，实现中日联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孙中山基于时势的现实考虑，当时中国内部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外部遭受列强侵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希望中国能够获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同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光靠中国自身，很难实现，于是孙中山希望能够得到日本政府的帮助，另一方面源于孙中山浓厚的日本情结，孙中山曾说“日本是他的第二之母邦”^③，孙中山浓厚的日本情结使他一直期望日本能帮助中国，实现中日合作，他特别希望能在“大亚洲主义”理论的框架下实现中日合作。

孙中山自称是“主张中日亲善之最力者”，主张中国和日本应摒弃前嫌，加强合作。1919年6月，孙中山在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中日“有同文同种之谊，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不向中国方面为侵略，则东亚庶有豸乎”^④？1923年11月，孙中山在《致犬养毅书》中说：

^① 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2页。

^② 孙中山：《致犬养毅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2页。

^③ 孙中山：《复宗方小太郎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4页。

^④ 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74页。

“此时日本政府当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对内可以统一，对外可以独立，一举而打破列强之束缚。从此日支亲善可期，而东亚之和平永保”^①。由此可知，孙中山认为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应摒弃前嫌，中国的革命需要日本的帮助，希望日本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

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说，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的先进国，特别是日本击败沙俄之后，使亚洲受压迫的民族看到了希望，鼓舞着亚洲其他国家“做种种独立运动……要做亚洲的主人翁”，孙中山认为日本的独立和复兴鼓舞和激励着亚洲受压迫的国家。他说，“中国同日本就是这种运动的原动力……我们在亚洲东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联络的”，由此可知，孙中山认为中日两国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中日两国一定要合作，一定要先完成独立。他还对日本民众说，“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②，由此可知，孙中山宣扬“大亚洲主义”的主要目的方面是抵御欧美列强的侵略，争取亚洲民族国家的独立，复兴亚洲，另一方面是委婉地劝诫日本国民和日本政府，应帮助中国革命和亚洲革命。

孙中山主张中日合作是为了实现中国独立，因为当时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中日合作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与独立，也有利于日本扩大中国市场，获得更多利益。孙中山生前极力希望中日能够合作，一方面是因为孙中山对日本的特殊情结，孙中山每一次革命失败后，日本都成了他的政治避难所。在日本避难时，很多日本有志之士对他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使孙中山对日本抱有较大的好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是当时亚洲为数不多的独立国家，是先进国，实力足够强，日本有能力帮助中国实现独立。孙中山虽然明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也做出了一些警惕，但孙中山还是寄希望于日本政府能够变易立国之方针，却屡次碰壁，1924年11月，孙中山绕道日本，原本想前往东京对日本政界进行演讲，却被日本加藤高明内阁拒绝，而他的日本友人也拒绝见他。对于孙中山绕道日本，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认为孙中山有较强的亲日思想，所以此次专门绕道日本，因此他评论道，“除了他从日本之行中获得的亲身感受，没有什么能作为消除他对日本幻想的

^① 孙中山：《致犬养毅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3页。

^②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2、404、409页。

有力论据。此次赴日只会使他变得聪明一些”^①，最后果然如鲍罗廷所预计的一样，孙中山失落而归，12月20日，他抵达天津，对马伯援说，“你一定要去日本，可注意日本外交……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②，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日本民众身上，向日本民众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希望能够通过日本民众影响到日本政府，但从结果上来看，事与愿违，无疾而终。在孙中山生前，日本政府对“大亚洲主义”没有太多关注，而孙中山死后，日本政府却极力利用和改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以配合和美化日本的对外侵略，孙中山期望的中日合作最后被日本演变成日本想独霸中国，想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

（三）反对帝国主义

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尤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十分警惕。1919年6月，孙中山在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时说，“日本对德宣战，于攻克青岛之时，则对列强宣言以青岛还我。乃于我参加欧战之日，则反与列强缔结密约，要以承继德国在山东之权利……中国此回所以痛恨日本深入骨髓者，即在此等之行为也”。孙中山说中国人敌视日本人的原因是日本侵占中国山东，还想把山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还指出：“乃日本人士倡同文同种之亲善，而其待中国则远不如欧美。是何怪中国人之恨日本而亲欧美”^③，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山东的政策进行了严厉地谴责，怒斥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敦促日本政府放弃霸权政策，放弃侵略中国的方针，否则不要怪中国人如此痛恨日本。同年10月，孙中山在《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中指出，“今者二十一条款暨他密约……诸君当知缔约、废约之权，本属国会，故以全权还之国会，即诸君之所求，无不可得。如使国会不能恢复以从事其本来之职分，则惟有重新革命，以尽去此篡窃之人……而此条约亦当否认矣”^④。孙中山在此强调要开国会并恢复国会的职能，如果不能恢复，那就再次革命，打倒一切旧军阀旧官僚，开国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恢复国会的职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反对帝国主义是“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所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68页。

^②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③ 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页。

^④ 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2页。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让中国人明白不驱逐欧美势力，中国就不能获得独立，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不断膨胀，企图独霸中国，因此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也十分警惕。但孙中山还是期望中日能够合作，所以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孙中山一方面肯定和赞扬日本，他说日本给亚洲国家树立了榜样和信心，指出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成功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独立，鼓舞和激励着亚洲各民族进行独立运动。另一方面孙中山在演讲中主要反对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指出，“美国有一位学者曾做一本书……照他的主张……亚洲的民众解放运动，更是应该当作反叛事业……所以他们……把那种流毒推广到亚洲，来压制我们九万万民族”。孙中山严厉谴责了欧美列强对亚洲国家的殖民和侵略，严肃批评了欧美的“有色人种论”。对于欧美的殖民侵略和压迫，孙中山认为东方文化虽然讲仁义道德，通过感化来影响人，但对于欧洲列强，无法通过仁义来感化，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我们的权利，实现独立，必须使用武力，所以孙中山指出，“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①，因此，孙中山强调亚洲受压迫的国家应首先联合起来，加强合作，并认为亚洲各民族联合起来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用这种力量去打破欧洲人的束缚，一定能够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明确提出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对欧美列强使用武力以实现民族独立，而对于日本，只是适当地劝诫，说日本是到底是当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当东方王道的干城，全由日本人自己决定。但孙中山此次北上专门绕道日本就是想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期望中日能够合作，可希望最终落空，失望而返。

学术界对孙中山是否有“大亚洲主义”思想一直有较大争论，有学者认为，孙中山不是大亚洲主义者，他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大亚细亚主义”、“建设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是对立的，其基本思想是“反对日本侵略亚洲、独霸亚洲”^②。孙中山虽然借用过“大亚洲主义”之类的词语来表达其复兴亚洲的思想，但“我们不能依此而论断他是提倡大亚洲主义的大亚洲主义者”^③。也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有“大亚洲主义”思想。黄德发认为，主张亚洲各国联合起来的“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的思想，这是“无可置辩的”，并认为有色人种论和宫崎寅藏的“支那革命主义”对孙中山产生“大亚洲主义”思想起到了

^①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4、408页。

^② 赵矢元：《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选自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186页。

^③ 周兴樑：《孙中山复兴亚洲思想略论》，《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年第5期。

重大影响^①。陈锡祺认为，孙中山在 1897 年的一些言论就有了后来“大亚洲主义”的思想成分，后来渐渐形成一种完整的思想，并认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核心，是联合亚洲被压迫民族反对西方列强^②。吴仪则认为“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还认为“大亚洲主义”是为了加强中日合作^③。

这两种说法一直争执不下，但笔者通过对孙中山思想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孙中山具有“大亚洲主义”的思想，他提出“大亚洲主义”是为了促成中日合作，期望日本帮助中国实现独立与自由，也是为了联合亚洲其他受压迫的民族以实现亚洲的独立与解放，同时我们要认识到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主张以日本为中心，强调日本的指导地位，并打着驱逐欧美势力、解放亚洲的口号，使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显得十分“合理化”。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虽然主张中日联合，同时联合亚洲其他受压迫的国家，但强调以平等为前提，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这是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主要目的之一。

第二节 抗战前国民党和日本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

（一）抗战前国民党高层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

戴季陶和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孙中山逝世后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和解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戴季陶受“大亚洲主义”的影响，继承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中关于世界上被列强压迫的民族，只有团结起来，才可能抵御列强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因此亚洲受压迫的民族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列强侵略的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他提出了东方联盟思想。戴季陶的东方联盟思想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积极谋求亚洲受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1930 年 5 月，他组织成立了“新亚细亚学会”，创立《新亚细亚》月刊，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新亚细亚》月刊在创刊宣言中，声称：“以宣扬三民主义为要旨，研究以主义为原则的中国边疆和亚细亚民族解放问题”，还指出戴季陶说：“总理是常常讲大亚洲主义的，大亚洲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主义呢？不是的……总理讲大亚洲主义就是把三民主义运用到民族国际方面，好比总理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就是把三民

^① 黄德发：《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问题平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 1 期。

^② 陈锡祺：《孙中山与日本》，《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4 期。

^③ 吴仪：《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时代意义》，《“孙中山北伐与梧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 年。

主义的原则运用到救国方面”，在此，他论述了“三民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关系，他认为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而“大亚洲主义”是三民主义被运用到了民族国际方面。他说：“因为要拿三民主义来救中国，所以说三民主义是救国的主义，因为要拿三民主义来救亚细亚民族，所以也就是无异说三民主义就是大亚洲主义。中国人在中国复兴的观点上要坚确地信仰三民主义，亚细亚民族在亚细亚有色人种复兴的观点上要坚确地信仰大亚洲主义”。在此，戴季陶认为中国人应坚定地信仰“三民主义”以实现中国复兴，亚洲人应坚定地信仰“大亚洲主义”以实现亚洲复兴，而戴季陶的这些观点，后来被汪精卫不断的延伸和扩大，离它的本义越来越远。

在亚洲复兴上，戴季陶希望亚细亚民族要坚信“大亚洲主义”，坚信“三民主义”，他还指出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区别，他说“讲大亚洲主义的人很多，在东方已经取得强盛地位的国家就以大亚洲主义为标榜以达其统一亚细亚之迷梦，还有许多武人政客为献媚于帝国主义起见也是鼓吹大亚洲主义。总理并不因为一般人鼓张邪说而对于‘大亚洲主义’一名词有所忌讳，因为总理是站在很坚确的三民主义的立场上，总理所讲的是三民主义的大亚洲主义……总理逝世对国民党同志有遗嘱的文字，而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也无异是对于东方各民族的遗嘱”，在此他指出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武人政客所宣扬的“大亚洲主义”的区别，他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是正义的，是为亚洲受压迫民族抱不平的，而武人政客宣扬“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既有为了对外侵略以实现其统一亚洲的迷梦，也有为了配合帝国主义，讨帝国主义的欢心，同时他还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东方各民族应该遵从的遗嘱。

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孙中山说日本是要当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当东方文化的干城，全由日本人自己决定，孙中山在这里委婉的劝诫日本国民，希望日本人能做东方文化的干城。受其影响，《新亚细亚》月刊在创刊宣言中也积极呼吁“日本要放弃以前的恃强凌弱的不道德行为，要抱定扶弱抑强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日本的武力要用作有色人种复兴向白人反攻的武器。以前在日本不道德行为之下被牺牲民族应还其本来之自由”^①，希望日本政府来帮助亚洲一同复兴，而不是助纣为虐去帮助欧美国家来侵略亚洲其他国家。1932年，在《新亚细亚学会纲领及总章》中，戴季陶说：“新亚细亚学会，以复兴中国民族，

^① 《创刊宣言》，《新亚细亚》1930年第1卷第1期，第12-13页。

发扬亚洲文化为目的”^①，他还认为要想实现亚洲复兴，必须先解决中国的问题，先实现中国复兴，因为“中国问题是亚细亚一切民族问题的枢纽，中国复兴是亚细亚民族复兴的起点”^②。在《新亚细亚学会之使命》中，戴季陶说：“如果要求得世界文明……一定要世界上文化最古的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发展起来”^③。戴季陶和新亚细亚学会都强调中国文化和中国复兴对于亚洲文化和亚洲复兴的重要性。戴季陶提出要先解决中国问题，复兴中国文化，因为中国问题是亚洲问题的关键，中国复兴是亚洲复兴的起点，提倡以文化合作为基础，再进行政治合作，联合亚洲其他受压迫的民族一起抵御欧美列强的侵略，实现亚洲复兴。

在戴季陶之后，国民党高层的重要人物胡汉民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也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和理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了中国民众强烈地不满，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胡汉民将“抗日”与“大亚洲主义”联系起来，从自身的现实考量出发，积极阐释和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1933年到1936年，胡汉民发表了三篇有关“大亚细亚主义”的文章，即《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再论大亚细亚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这三篇文章集中体现了胡汉民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阐释。

1933年，胡汉民在《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中说：“在孙先生大亚洲主义演讲中，我们对于大亚细亚主义，至少该认明两种特质；大亚细亚主义的目的是在打破欧洲霸道民族对亚洲民族的压迫，恢复亚洲民族固有的地位，大亚细亚主义的方法是在以亚洲民族固有的王道文化做基础，联合各部民族为亚洲民族之共同利益而奋斗”，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企图对于整个亚洲民族的统制主义或委婉些说：乃是日本对于亚洲的门罗主义……企图以亚洲的盟主自居”，还指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当然也要建立在健全‘满洲国’的国策上，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原来只是健全‘满洲国’政策的一种掩护”。文章还引用了时任日本外务次官泷正雄的讲话，说：“最近所谓亚细亚主义，极东门罗主义，诚为今后日本外交之中心思想”^④。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与“极东门罗主义”的内容是一方面拒绝欧美各国对于远东事务的过问和干涉，一方面积极贯彻其满蒙政策，为实施其大

^① 戴季陶：《新亚细亚学会纲领及总章》，《新亚细亚》1932年第3卷第4期，第16页。

^② 《创刊宣言》，《新亚细亚》1930年第1卷第1期，第11页。

^③ 戴季陶：《新亚细亚学会之使命》，《新亚细亚》1931年第2卷第3期，第166页。

^④ 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三民主义月刊》1933年第2卷第4期，第2-3页。

陆政策之开端，胡汉民在这里比较和分析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和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不同，他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以仁义道德为基础，联合亚洲被压迫的民族，打破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实现亚洲民族的独立与平等，而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以亚洲盟主自居，独霸亚洲的门罗主义。胡汉民还猛烈抨击了汪精卫的对日政策，当时担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公开说“亲日政策有考虑余地了”，胡汉民说这是“南京政府对日磕头礼拜政策”，让他十分惊诧与愤怒！同时胡汉民表明了他的态度，说“只有对日抗战，是中国的唯一生路。除抗战外，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挽救中国之危亡”，还说“我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以对日抗战来自救，由自救以建立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大亚细亚主义”^①。由此可知，胡汉民把“抗战”和“大亚洲主义”联系起来，他一方面严厉抨击汪精卫的亲日政策，另一方面坚定地表明他对日抗战的态度，他认为只有通过抗战才能实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认为这是中国的唯一生路。

关于民族主义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关系，胡汉民在1934年发表的《再论大亚细亚主义》中做了详细地阐述，他说：“孙先生何以要讲大亚细亚主义呢？就为的实行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间的一层连锁……所以讲大亚细亚主义，一方面要完成民族主义，一方面要促进世界主义”。他将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归纳为三个部分，“一是东方的王道主义，不是西方的霸道主义，二是济弱的扶倾主义，不是巧取的豪夺主义，三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帝国主义的独占主义”，由此三部分组成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以王道文化为基础，以实现亚洲民族独立和复兴为最终目的。同时，胡汉民还猛烈批评了日本宣传的“大亚细亚主义”，说“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以皇室为中心的统制全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是日本独占亚洲主义”，胡汉民深刻认识到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并说这与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完全不同，还指出“日本此时，努力做着西方霸道的鹰犬，并不想做东方的干城。日本的一切残暴行为，断不为大亚洲主义所容许”^②。胡汉民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严重损害了“大亚洲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是不被“大亚洲主义”所容忍的，更不可能谈什么“中日亲善”，因此，他认为中国只有抗战一条生路，只有通过“抗战”才能实现“大亚洲主义”。

^① 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三民主义月刊》1933年第2卷第4期，第4、3、13页。

^② 胡汉民：《再论大亚细亚主义》，《三民主义月刊》1934年第4卷第3期，第15、18、19、18页。

1935年3月,胡汉民在《日本评论》上发表了《我等的大亚细亚主义》,在文中胡汉民对土肥原贤二说:“所谓中日提携原则上完全有同感,它是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惟一道路。孙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正如其遗嘱那样,是与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才是真正的王道主义……为被压迫民族打不平,这是大亚洲主义之精神。然而,日本主张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统治亚洲民族,不外是亚洲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是帝国主义者分割弱小民族的万恶主义”^①。对于胡汉民的批评,土肥原贤二并未予以回应。胡汉民曾说“孙先生的意旨在以最忠恳的态度,对日本国民作深刻的劝导,希望由者深刻的劝导,引起日本国民的同情的愧悔与真实的自觉。再希望由此愧悔与自觉,完成中国民族之独立,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主张”,但这种希望终究破灭,日本方面不仅毫无反省,而且还不断加大对中国的侵略,最终导致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1936年2月,胡汉民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一文中记载了胡汉民与松井石根的谈话。在文中,胡汉民首先回顾了与松井石根多年的友谊,其次严厉批评了日本的侵略政策,最后表明他主张抗日,是为了继承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但胡汉民和松井石根对“大亚洲主义”的理解却有着巨大分歧。松井石根认为:“中日两国必须本孙中山先生之遗教,体行大亚细亚主义,以维系远东之和平,谋中日之共存共荣”,但日本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上是“日本的门罗主义”,所谓的“共存共荣”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是帮助日本独占亚洲。针对松井石根的论述,胡汉民进行了严厉地驳斥,他说:“孙中山先生之大亚细亚主义,含义至为明显,约言之,为东方的王道主义的,非西方的霸道主义的,为济弱扶倾主义的,非巧取豪夺主义的,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非帝国主义的独占主义的;故与近时日人所艳称之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亦大异其趣”。而胡汉民阐释“大亚洲主义”,一方面表明自己的抗战态度,另一方面是批判日本所阐述的“大亚细亚主义”和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以达到自己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反蒋的目标。胡汉民虽然认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也进行了猛烈驳斥,但他还是说“余甚愿松井先生能矫正过去之错误,并启发日本国民之心理,以进于正义轨道之为得也”^②,把希望寄托在松井石根能主动改正错误,同时带领日本民众对华友好,此种希望,未免过于天真,事实也证明,松井不仅未能改变错误,反而还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① 胡汉民:《我等的大亚细亚主义》,《日本评论》第11卷第5号,第172-174页。

^② 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三民主义月刊》1936年第7卷第3期,第12、13、15页。

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亚洲主义思想大多都包含了“中日合作”或“中日亲善”的倾向，都对日本帮助中国抱有幻想，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缺乏足够的认识，而胡汉民是为数不多将“抗日”和“大亚洲主义”联系起来的人。胡汉民的这些文章，一方面是表明自己“抗战”的态度，认为他的抗日主张是为了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实践大亚细亚主义，还说“苟日本不能改变其对于中国之手段，则中国民族之抗日情绪……而出于最后之抗战”^①。另一方面是严厉抨击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作为国民党内部反蒋集团的领军人物，胡汉民积极借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严厉批评了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并宣称自己才是国民党的正统继承人。由此可知，胡汉民一方面通过把“大亚洲主义”和抗日联系起来，表明了自己抗日的坚定态度，争取国内民众的好感与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批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通过借用“大亚洲主义”来抨击蒋介石，以达到自己的反蒋目的。胡汉民借“大亚洲主义”来达到他的反蒋目标，而蒋介石从抗战开始到抗战结束，对“大亚洲主义”思想都并未给予多大关注，而更多是关注和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以显示其地位的正统性。

（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在日本的影响及认识

在日本，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最开始并未掀起大的波浪，日本政界和日本舆论都未给予重视，日本政界甚至不准孙中山前往东京，对孙中山的态度十分冷淡。日本学者最开始也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未给予多大重视，但其后，为了配合日本政府对外侵略的需要，日本学者开始积极借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日本东洋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在看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讲演稿之后，主张“采用西方功利强权的文化”以全力防止共产主义，他对共产主义充满敌视，还认为“大亚洲主义”就是要反对共产主义，所以他十分赞赏在思想上亲日反共的汪精卫^②。1940年1月，日本宪法学家宫泽俊义教授认为“孙文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而且“孙文主义不会有求于‘联俄联共’的政策”，因此他得出结论“孙文主义未必会妨害‘东亚新秩序’的建设”^③。由此可知，宫泽俊义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与共产主义是不相同的，他的“联俄联共”政策只是暂时的策略，孙中山并不会倒向苏俄，也不会倾向共产主义。

1940年，日本政治家河野密的《孙文的生平与国民革命》一书出版，

^① 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三民主义月刊》1936年第7卷第3期，第15页。

^② 井上哲次郎：《谈孙文〈大亚洲主义〉》，《日本评论》，1939年10月号，第54-56页。

^③ 宫泽俊义：《孙文主义与共产主义》，《改造》，1940年1月号，第94-96页。

他指出：“孙文在 1917 年写的《中国存亡问题》与 1924 年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在核心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①。汪精卫在《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一文中也说：“由此可见孙先生的根本信念，前后是一贯的。民国六年，他所重视的是中日合作……民国十三年，他所重视的也是中日合作……孙先生自始至终，抱定了一个信念，便是以中日合作作为解决东亚问题之核心”^②。所以河野密认为汪精卫宣扬孙文的“大亚洲主义”理想足以证明他是孙文“三民主义”的继承者。正因为如此，1940 年 3 月，汪伪政府在成立之后，同年 8 月开始发行和出版《大亚洲主义》月刊，积极借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积极寻找建立政权和支持中日合作的理论依据。

汪精卫集团和日本政府通过歪曲和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既找到了汪精卫集团建立政权的理论来源，也达到了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目的，在这种认识下，日本政府扩大中日战争不仅不觉得是侵略，反而认为是来帮助和解救被英美压迫的中国人民，并与“东亚新秩序”和“东亚联盟”理论相结合，并按大陆政策的需要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进行阐释和利用，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但在这种主流之下，日本仍有少数真正理解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人。他们从帮助受压迫民族打不平，使他们恢复自由和独立的立场出发，严厉驳斥了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期望日本政府能进行彻底反省。

其中代表人物是日本共产党员细川嘉六，他认为，日本的学界和政界至今都没有真正理解孙文指导中国革命的核心思想。他指出：“日本的东亚联盟论，东亚共同体论，都是尚未充分认识亚洲大陆革命事态的理论”，并认为孙文“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要目的是废除列强与亚洲国家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希望亚洲国家联合起来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亚洲复兴，他正确理解了孙文“大亚洲主义”的核心思想，形成这种认识之后，他得出结论，“孙文为实现这种意义的大亚洲主义，要求亚洲唯一的先进国日本与苏联一起，成为这种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将亚洲民族解放出来，并继续推行民族革新，进而向上发展民族”，并指出“如能通过日本的帮助，中国得以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么，日本将获得中国民众的好感，并可能缔结经济同盟乃至攻守同盟……行王道，就能实现大亚洲主义，如此而已，别无其他”^③。由此可知，细川嘉六认为孙中山

^① 河野密：《孙文的生涯与国民革命》（广播新书），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40 年，第 131 页。

^②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三民周刊》1940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46 页。

^③ 细川嘉六：《亚细亚民族政策论》，1940 年，第 41、42、46 页，转引自林家有、李明主编：《孙中山与世界》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85-186 页。

“大亚洲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要“行王道”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现亚洲各民族的独立，同时他还希望日本政府能正确理解“大亚洲主义”，并对大陆政策进行彻底的反省。但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最终破灭。除细川嘉六之外，1944年，高桥勇治教授在《孙文》一书中说：“孙文大亚洲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日本放弃霸道政策”^①。但细川嘉六和高桥勇治所理解的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不被当时日本社会主流所认同，最终被主流所淹没。

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橘朴积极支持日本政府对大陆政策进行改变，以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橘朴在《东洋枢轴论》一文中说：“孙文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是首先培养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其次是为实现这个民族意识的方法即组织亚洲联盟，最后是动员由这个联盟综合起来的东洋各种势力，来对抗西洋的各种势力”，还指出：“这与日本民族的世界政策是完全一致的”^②。由此可知，橘朴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民族的大陆政策是一致的，把“大亚洲主义”阐释为与日本的世界政策相一致，以满足日本政府对外侵略的需要。1945年，平野义太郎的《大亚洲主义历史之基础》出版，他指出：“不变的而不可动摇的是大亚洲主义，其轴心则为日华合作”，并把这阐释为是“大亚洲主义”的主要目标，认为“大亚洲主义”是“大东亚共荣圈”和“东亚协同体”的原理^③。由此可见，从1924年孙中山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政界和日本舆论界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从最开始未给予重视到之后积极借用“大亚洲主义”，虽然偶有一两个人能够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在整体上占主导的都是单一的片面的认识。由此导致他们对孙中山的日本观也形成了错误的认识，在错误的认识下而形成的日本对华政策，只是为了满足日本对外侵略的需要。究其原因，胡汉民曾指出中日矛盾如此之深的根源是“日本此时，努力做着西方霸道的鹰犬，并不想做东方的干城。日本的一切残暴行为，断不为大亚洲主义所容许”^④。

综上所述，通过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原文进行研究，我们可知“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复兴亚洲文化、期望中日合作和反对帝国主义，但由于孙中山在阐述一个概念时并不是通过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方式，而是通过罗列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这样的阐述方式，导致他的思想在内容上不够清晰明了，逻辑上不够严密，容易被人歪曲

^① 高桥勇治：《孙文》（东洋思想丛书17），东京：日本评论社，1944年，第207页。

^② 橘朴：《东洋枢轴论——孙文思想的东洋性格的考察》，《日本评论》，1943年7月号，第12页。

^③ 平野义太郎：《大亚洲主义历史之基础》，东京：河出书房，1945年，第132页。

^④ 胡汉民：《再论大亚细亚主义》，《三民主义月刊》1934年第4卷第3期，第18页。

和利用，如戴季陶、胡汉民和日本学者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就是典型例子。通过对这些例子的分析，可以得知，他们对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阐释和借用都是基于现实考量和自身政治目的的考虑。

第三节 抗战初期汪精卫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及国共两党的驳斥

抗战开始前，汪精卫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并未给予多大重视，但随着抗战不断深入，汪精卫逐渐由主战转向主和。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先后陷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和汪精卫都预计到战争在短期内结束是很困难的，此后汪精卫不断呼吁“和平运动”，借用和阐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把“大亚洲主义”作为其“和平运动”的理论之一，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积极活动，开始采取政治诱降策略。1938年1月，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年11月3日，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说“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12月22日，日本发表了第三次声明，表示“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①。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积极响应“近卫三原则”，并宣扬：“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②，汪精卫企图用“三民主义”来为自己的“和平运动”做辩护。在此之后，日本政府宣传的“近卫三原则”和“建设东亚新秩序”与汪精卫集团宣传的“和平运动”遥相呼应，而为了使他们的宣传“合理合法化”，他们不断借用和改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

1939年1月，汪精卫公开宣称：“今人说‘抗战就是一切’，抗日……是为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可见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是目的，抗日不过是手段……如今为什么主张议和呢？为的是如此才可以保卫国家之生存独立”^③。可知，汪精卫认为抗战和议和都是手段，目的是保卫国家的生存独立，还指出他此时主张议和也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独立。同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宣言》说“中日两国，无论从何方面着想，都应携手共同前进，以谋两国发展之前途”^④，《宣言》的目的是公开赞成近卫声明，宣扬亲日反共的政策，并把“大亚洲主义”阐释为“近卫三原则”相适应。1939年11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东京：原书房，1969年，第386、407页。

^② 汪精卫：《艳电》，《南华日报》1938年12月29日，第1版。

^③ 汪精卫：《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南京：汪伪宣传部，1940年，第7-9页。

^④ 波多野干一：《中国国民党通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2年，第558-559页。

月23日,汪精卫在日军宣传机关发表《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的演讲,向日军宣称“民族主义则产生在中国固有的和平思想上,根本就没有排外的意思……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孙先生的民生主义则主张阶级合作,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没有反帝的意思,是不排外的,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完全不同,并强调三民主义不会阻碍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他把“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都阐释为“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①以达到把“近卫三原则”和“大亚洲主义”联系起来的的目的,由此可见,为了迎合日本的需要,争取日本的支持,汪精卫通过借用和改造“大亚洲主义”思想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

韩慕周在《从纪念总理诞辰说到和平运动》中说:“近卫公发出和平声明……我们应该开诚接纳,并从而停止战争行为……总理在大亚洲主义里明白昭示我们,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即无日本。今日本既已改换了面目以平等互惠善邻友好来重整邦交,那末我们正应秉承总理遗教……埋头于东亚福利之建设,他方面更应趁此欧战胶着,列强无暇旁顾的机缘,摆脱欧美政治、经济、军事的束缚,将大亚洲主义的真意重新发扬起来,并从而付诸积极性的实践,使今后的东亚成为自主兴隆的东亚,今后的中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可知,他认为近卫文磨发出第三次声明是发扬“大亚洲主义”的真意,中国应与日本一起积极实践,复兴东亚,复兴中国。还说“大亚洲主义的中心意义乃是以亚洲人为亚洲之主人翁,要亚洲人从欧美政治压迫与经济束缚中解脱出来”,因此要开展“和平运动”,实践“大亚洲主义”,而“和平运动,任何人都知道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原理的,对内是以三民主义的国民党领导各党各派共同努力,完成伟大的使命,对外则取独立平等的立场,与日本携手,努力建设新东亚,而完成总理大亚洲主义之根本精神”^②。可以看出,他认为开展“和平运动”是为了与日本携手,一起实践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日本学者土屋光芳认为汪精卫利用“三民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主要原因是,“汪精卫阐述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适用到亚洲便是‘大亚洲主义’。这一理论与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东亚共荣圈’形成照应……以此强化其作为和平政权的思想基础”^③。由此可知,土屋光芳认为汪精卫阐释“三民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是一方面配合和

^①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三民周刊》1940年第2卷第1期,第46页。

^② 韩慕周:《从纪念总理诞辰说到和平运动》,《知行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第48-50页。

^③ 土屋光芳:《汪兆铭政权论——基于比较合作的考察》,东京:人类科学社,2011年,第222页。

照应日本的“东亚新秩序”论，另一方面是巩固汪伪政府“和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土屋光芳的观点揭露了汪精卫利用“三民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本质。

汪精卫集团认为“和平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还指出“复兴中国与复兴东亚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国父一方面提倡三民主义以建设新中国，同时提倡大亚洲主义，以复兴亚洲。因为中国的革命与亚洲的革命是同其命运的，亚洲整个民族不能解放，中华民族也自不能解放，中国是亚洲一个大国，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亚洲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而亚洲的革命对象是欧美的侵略主义与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所以“自从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双方才深切的反省，中国方面实行国父大亚洲主义的遗教，日本方面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大亚洲主义是要向欧美经济侵略主义革命的，建设东亚新秩序则要推翻欧美用压力所缔结之旧秩序的，中日两国的目的相同，我们的行动自然一致，我们要达到东亚民族解放的目的，实现中日共同的理想，所以提倡东亚联盟的兴亚运动，也就是用东亚联盟的四大纲领，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来完成东亚的革命……和平理论主张中日两国结成东亚的和平轴心，以建设东亚新秩序”^①。为了满足自身的政治需要，汪精卫对“大亚洲主义”思想的态度由最开始的不关注到之后积极借用，积极阐释。汪精卫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中找到了可供发挥的余地，试图把自己与日本的合作阐释为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实践。这么做的目的既满足了日本的宣传需要，也在“中日亲善”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外衣之下为其“和平运动”找到“合理性”依据。汪精卫认为他宣传的“大亚洲主义”，虽然有时为了迎合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与“大东亚共荣圈”做了一些改动和延伸，但他认为这是为了“和平运动”所必须要做的。汪精卫认为和平运动的目的是建国，是求中国民族复兴。在一切为了“和平运动”的认识下，汪精卫开始以更积极的态度利用和改造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

为了配合“和平运动”和“近卫三原则”，汪精卫积极改造“大亚洲主义”，声称“近卫三原则”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②，对此，国共两党都进行了严正地驳斥和强烈地批评。

对于日本的诱降活动，中国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认识。1937年《解放周刊》发表时评《日寇分裂中国的伎俩》，并在文章中引用了11月15日伦敦《泰晤士报》的观点，该观点指出，“日寇灭亡中国的政策，武力政

^① 周化人：《和平理论之发展及其实现》，《大亚洲主义》1941年第3卷第3期，第18-23页。

^②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三民周刊》1940年第2卷第1期，第46页。

策和分裂政策是不可分离的，并认为日本搞‘和平’运动的实质，就是分裂中国，使中国屈膝，并笼络华北的人民”。时评还指出“在现在，中国对日妥协就是灭亡，这是不容争辩的。中央社也说，妥协就无异汉奸……我们希望中央政府立即纠正目前的弱点，肃清汉奸，继续抗战”^①。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认为灭亡中国是日本的既定政策，如果此时对日妥协就是自取灭亡，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抗战，要对日本的诱降活动保持清醒，反对一切妥协行为。

1938年3月12日，周恩来指出，要“学习孙先生的伟大并实行孙先生的伟大遗志，争取抗战胜利，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②。可知，周恩来认为纪念孙中山就是学习并实践孙中山的遗志，坚持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而针对“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进行了强烈地反驳。1938年12月，蒋介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讲话《严正驳斥近卫声明》，蒋介石猛烈抨击了近卫声明，他指出，“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拆穿来说：他们的所谓‘经济集团’，就是要收中国整个的财力资源，受日本之统制，以代替其所谓‘不要赔款’。他们要求华北内蒙驻兵，要求中国全部领土内自由居住和营业，就是要使中国全部土地受其统治与支配，中国全部人民任其压迫和奴使，以代替其所谓‘不要割地’……什么是‘东亚协同体’？干脆就是‘中日合并’，就是要把整个中国归并于日本”^③。蒋介石对“近卫三原则”进行猛烈地抨击，认为日本所谓的“不要赔款”实际上是想统制中国全部的财力资源，所谓的“不要割地”实际上是在中国驻兵以统治中国全部领土，所谓的“东亚协同体”实际上是日本吞并中国，把中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实际上是日本企图独霸太平洋称霸亚洲的代名词。因此蒋介石要求中国军民要坚定立场，坚定信心，全国一心，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人民。对于汪精卫发表“艳电”，蒋介石抨击说：“本日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还指出“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④。可知，蒋介石不仅逐条驳斥了“近卫三原则”，也严厉抨击了汪精卫的“艳电”，谴责其通敌卖国，害国害民。

1939年1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做出了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的决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为汪电

^① 《日寇分裂中国的伎俩》，《解放周刊》1937年第1卷第25期，第3页。

^② 周恩来：《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新华日报》（汉口）1938年3月12日，第4版。

^③ 蒋介石：《严正驳斥近卫声明》，《中央日报》（重庆）1938年12月29日，第2版。

^④ 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38年12月31日，台北：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印，2015年，第119页。

开谈话会……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还感叹说“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①。而中共中央针对汪精卫的“艳电”,发出了《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对“艳电”予以坚决驳斥,尤其是批评汪精卫的反共主张,反共主张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汪精卫积极迎合“近卫三原则”的结果。因此,中共中央号召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并戳穿和揭露他的反共阴谋。汪精卫响应“近卫三原则”中的“共同防共”原则是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时的背景是国民党在召开五中全会前明显加强了反共,制造摩擦,国共合作面临着破裂的危险,因此汪精卫和日本加强宣传反共思想,其实质是日本和汪精卫为了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阵营而使出的反间计。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破裂,同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在这篇电文中中共中央向蒋介石阐述了汪精卫反共主张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并希望蒋介石立即停止制造摩擦,积极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既不要中汪精卫的反间计,也不要国民党五中全会上通过破坏统一战线的提案。中共中央指出,“日寇汉奸深知我民族团结之基础与骨干,实为国共两党之合作”,于是日本和汪精卫想尽办法破坏国共合作,反共主张就是其中最大的阴谋诡计。中共中央曾多次引用蒋介石的讲话来抨击汪精卫的反共主张,同时极力称赞蒋介石在《严正驳斥近卫声明》中提到的“反共即灭华”的观点,所以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和《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中都谈到了这一观点即“反共即灭华这一真理”。中共中央还认为反共就是想当汉奸,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反汪运动给南方局的指示》,指示南方局“利用反汪运动的机会……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派的阴谋……我们应……巩固国共合作和巩固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②。由此可知,对于妥协派的活动,中共中央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要坚决抵制一切投降派的活动。二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开展一切反对汪精卫的运动,以达到驳斥和抵制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增强群众的反投降意识。

1939年10月,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蒋介石公开抨击汪精卫为“汪逆”,谴责其“卖国投敌”,说“余受国民付托,职在捍卫我国家,汪逆受敌人指使,欲出卖我国家,予之地位,不仅应为本党诛此败类,更应为国家

^① 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39年1月1日,第6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1939-1940),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16、17、21、76页。

除此元恶”，并进一步指出汪精卫是“罪恶昭著”的“汉奸罪犯”^①，其“和平运动”是卖国投敌的运动。蒋介石还通过各种方法来阻碍和打击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积极策反高宗武和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和公布“汪日密约”等等。针对“汪日密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强调全国同胞在看完“汪日密约”之后，可以得知日本的“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久驻军’，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占’”^②，这就是“近卫三原则”的真面目，还评价说：“敌阀与汪逆订立……密约，阅之发指。汪逆万恶一至于此”^③，公布“汪日密约”不仅戳穿了汪精卫的汉奸面目和日本的侵略野心，还打击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对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英国驻华使节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英国驻华使节克拉克·科尔曾向英国外交部递交过一份有关汪精卫与日本政府和谈的报告。这篇报告不仅评价和分析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还指出由于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和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以及第三次近卫声明的不确定性，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汪精卫无法成立一个独立且卓有成效的政府^④，事实也证明明确如科尔所言，汪精卫最终只是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既不独立，也没有成效。

综上所述，汪精卫对“大亚洲主义”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也是为了配合日本的舆论宣传需要。汪精卫对“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和改造，国共两党都进行了严厉地驳斥，有利于帮助民众辨别黑白，增强民众的抗战意识。

^① 《总裁严斥汪逆兆铭》（1939年10月1日），《汪精卫卖国阴谋之总暴露》，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1940年，第119-120页。

^② 《蒋委员长告全国军民》，《大公报》（重庆）1940年1月24日，第2版。

^③ 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40年1月20日，第14页。

^④ 转引自大卫·巴雷特著、单富粮译：《英国外交档案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及汪政权的部分历史档案文件》，《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第43-44页。

第二章 汪伪政府成立后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

1939年8月,汪精卫召开伪“国民党六大”,为成立“新政权”积极做着准备。汪精卫通过利用和改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同时积极配合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随后汪伪政府发起东亚文化复兴运动,同时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作为其建立政权的“合理性”依据之一,企图通过文化沟通和“大亚洲主义”来引起国人的亚洲认同。

第一节 寻找“建国”的“合法性”依据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发表《国民政府还都宣言》,他宣称:“所谓实现和平,在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确立将来亲善之关系……所谓实施宪政……个人独裁,为全国人民精诚团结之障碍,必当革除,共产党……尤为国家民族之大敌,必当摧陷廓清……国民政府此次还都南京,为统一全国……全国以内,只有此惟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可知,汪精卫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立即停战,与日本实现和平,接受“近卫三原则”,确立“中日亲善”。第二是实施宪政,革除个人独裁,积极反共,肃清共产党之余毒。第三是强调汪伪政府才是中华民国“正统”的中央政府,并期望重庆蒋介石政府应“破除成见,亟谋收拾,统一于国民政府”^①。汪伪政府企图通过宣传“还都”南京来标榜他们才是中华民国的“正统”继承者,还企图通过宣传实现和平、实施宪政来分裂抗战阵营,以便他们争取和拉拢民心。汪伪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全国的军心和民心,对抗战造成了恶劣影响。

对于汪精卫谋划成立伪组织,国共双方和美国舆论都进行了严厉地驳斥。1940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号召“全国讨汪……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以求“务绝汪党”,还认为“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②。可知,中国共产党举行“讨汪”大会,希望蒋介石政府在全国范围掀起“讨汪运动”,坚决抵制投降

^① 《国民政府还都宣言》,《国民政府公报》1940年第1期,第1-2页。

^② 毛泽东:《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21页。

活动，坚持抗战到底。2月7日，毛泽东在《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中说，“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①，毛泽东再次强调坚持抗战就要反对和抵制一切投降活动，特别是反对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3月12日，白崇禧发表《纪念总理必须完成抗战建国》一文，说“总理解释‘不合作’的意义……就是我们应该不参加伪组织，不为敌人当兵，不做汉奸……日本的野心……总理已经在三民主义讲演中揭穿”^②。白崇禧认为纪念总理就必须完成抗战建国，不能做汉奸。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现在日寇正在千方百计‘软化’我们，我们只有实行孙中山先生遗教，坚持孙中山先生不妥协精神，坚持抗战到底”^③。3月25日，《前线日报》转载美国合众社在3月23日就汪精卫准备成立伪政权发表的观点，即“东京方面扬言汪组织之成立，等于以中国还诸中国”，但美国合众社评论称日本所谓归还侵占中国的领土以支持汪伪政府，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欺骗蒋介石政府和国际社会，并指出这是“日本或将在最后总崩溃前对华言和”^④，日本的目的是想诱降蒋介石政府，结束中国战事，但此种阴谋诡计蒙骗不了蒋介石政府和国际社会。

3月29日，国民党主席林森发表《痛斥汪逆伪组织》的讲话，说汪精卫：“拿屈辱和平的论调做叛逆行为的掩护，举行叛党叛国会议，并且有组织伪政权的阴谋，企图盗用名器，妄称继承法统，淆惑视听”，并指出伪政权只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临时工具，是“敌人换一个方式来侵略”，随后号召“全国同胞齐心协力，团结精神，坚持抗战立场，肃清汉奸”^⑤，林森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是屈辱的和平，是叛党叛国的和平，痛斥汪精卫叛党叛国之罪恶，号召全国同胞坚持抗战，抵制汉奸。3月30日，《中央日报》发布《汉奸七十七名，国府明令通缉》的通缉令，全国通缉汪精卫等七十七名汉奸，表示要严惩汉奸^⑥。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怎样估计汪逆的傀儡政权》，对汪伪政权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文中说：“它可以利用伪‘中央政府’的招牌，去招摇撞骗与一些国家阴谋家进行勾结；它可以利用其伪‘中央政府’的招牌，去与敌寇做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⑦，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认为，汪伪政府的出现，对内会加剧抗战阵营的分裂，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对外会与国外法西斯勾

^① 毛泽东：《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9页。

^② 白崇禧：《纪念总理必须完成抗战建国》，《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12日，第3版。

^③ 《实行三民主义纪念孙中山先生》，《新华日报》1940年3月12日，第1版。

^④ 《美报讥斥汪傀儡》，《前线日报》1940年3月25日，第1版。

^⑤ 林森：《痛斥汪逆伪组织》，《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30日，第2版。

^⑥ 《汉奸七十七名，国府明令通缉》，《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30日，第2版。

^⑦ 《怎样估计汪逆的傀儡政权》，《新华日报》1940年3月30日，第1版。

结,破坏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统一,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危害。4月1日,《新华日报》再次发表文章,深入分析了汪伪政府的傀儡本质,认为必须要揭穿汪伪政府的汉奸本质,同时加强抗日力量的团结,粉碎日寇“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企图^①。《新华日报》对汪伪政府及时的揭露和批判,揭示了其卖国投降的傀儡本质,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加强了民众的抗战意识。

但4月26日,汪精卫在“还都”典礼上的讲话,却认为他是以“罪己的精神”来进行“和平运动”的,声称“没有‘罪己的精神’,则必不能担负起和平反共建国的责任,有些人不敢从事于和平运动,是缺乏此种精神的原故”^②。汪精卫认为他从事“和平运动”正是出于“罪己的精神”,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是为了保全国脉,保存民命,并担负起“和平反共建国”的责任。由此可知,汪精卫不仅认为他的“和平运动”不是卖国,反而是以“罪己的精神”来担负起“和平反共建国”的责任,企图以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迷惑世人。

对于汪伪政权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找到建立政权的思想基础,汪精卫为了找到建立政权的“合理性”依据,因此积极借用和改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阐述他的“和平建国运动”是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孙中山“和平救国”的遗愿。

为了更好地利用“大亚洲主义”,1939年7月,汪精卫说:“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必须使日本知道中国革命之成功,于日本有利……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合作……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③,汪精卫在此公开宣称中国革命如果成功,中日两国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对日本十分有利,因此汪精卫希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同年11月,汪精卫发表《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一文,对于“近卫三原则”,他宣称:“就第一个原则来说,善邻友好,正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就第二个原则来说,共同防共……是共产主义……不能流毒于东亚,这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就第三个原则来说,经济提携……是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力量……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善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外交方针一致才可以保持。共同防共,便要国防方针一致,而经济提携是东亚联盟结成的基础。于是汪精卫进一步指出:“为了两国的存亡安危,中日合作,不但于中国

^① 吴克坚:《汪逆伪组织成立的阴谋作用》,《新华日报》1940年4月1日,第4版。

^② 汪精卫:《罪己的精神》,《新东方杂志》1940年第1卷第3期,第86页。

^③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三民周刊》1939年第1期,第19页。

有利，并且于日本有利，于东亚有利，在合作的原则之下，中国和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国防方针一致……可以携手共进，以应付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才可以奠定东亚之永久和平，只有这样，才可以谋大亚洲主义之实现”。在这里，汪精卫认为中日合作对中日两国都十分有益，强调“近卫三原则”有助于实现中日合作，更有助于实现“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说“总理盼望由中日的友好关系，扩而充之，做到日美关系的好转，以确立中日美间友好的关系，而以中日合作为其前提”，声称“孙先生重视中日关系……始终望日本和中国，彼此要做朋友，不要做敌人”，还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日本都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着同样的命运，中日又同文同种，“近卫三原则”的目的是使中国摆脱欧美的经济侵略和经济压迫，从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孙中山说：“要想从次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做到中国的自由与平等……第一是要中国自己努力，第二是要与先进国的日本共同努力”^①。如果中国没有获得独立和自由，就不能承担建设东亚的责任，如果东亚不解放，中国就不能获得独立。中国的独立和东亚的解放相结合，有助于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汪精卫在这里再三强调孙中山重视中日合作，而他是继承孙中山的对日合作思想，期望在“大亚洲主义”的旗帜下与日本加强合作。再进一步说：“孙先生的民族主义，本以世界大同为理想，不过他以为欲求世界大同之实现必须先救东亚，而欲救东亚必须中国自身先行获得独立解放，他主张由民族主义出发，中经大亚洲主义之实现，而以世界大同为理想的终结”^②。由此可知，汪精卫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以世界大同为理想，而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救东亚，而要救东亚，必须先实现中国的独立，再实现“大亚洲主义”。他还声称：“日本今为强国，日本人今为强国之民，其欲进一步改造东亚，诚当然之事至于中国人今第忧其亡国之不暇，乃能忧及东亚乎？”^③可见实现“大亚洲主义”的先决问题，是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自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汪精卫认为就要接受和实践“近卫三原则”，与日本一起建设“东亚新秩序”。

1940年11月，汪精卫发表《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一文，说“没有民族主义，不能唤起中国民众的自觉……没有大亚洲主义，不能唤起东亚民众的自觉”^④。可见实践民族主义和大亚洲主义对于中国和东亚十

^①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三民周刊》1940年第2卷第1期，第45-46页。

^② 周化人：《实现大亚洲主义的先决问题》，《新东方杂志》1940年第1卷第4期，第21-23页。

^③ 汪精卫：《中国与东亚》，《华南公论》1939年第1卷，第26页。

^④ 汪精卫：《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中央导报》（南京）1940年第1卷第15期，第2页。

分重要。汪精卫还认为日本是以平等来对待中国的，并强调要与日本一起实现“大亚洲主义”。为了让“大亚洲主义”更好的配合“东亚联盟”，同年11月，汪精卫为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撰写训词，指出“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之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实现”^①。汪伪政府宣传的“大亚洲主义”着重强调反对欧美的侵略和压迫，而对日本赤裸裸的侵略和掠夺却只字不提，甚至极力为其辩护，说日本侵占中国的国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赶走西方列强，其理论本质是日本“东亚新秩序”的代名词，是为了配合和满足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需要。

汪精卫在解释东亚与中国的关系时说：“爱中国与爱东亚是一条心”^②，他认为东亚与中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日本是东亚最先进的国家，因此必须联合日本，争取日本的支持，再联合亚洲其他受压迫的国家，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进而实现亚洲各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一起建立“东亚新秩序”。汪精卫强调要实践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但汪精卫宣传的“大亚洲主义”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孙中山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时候，中国正在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孙中山希望日本也像苏俄那样，撤废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与日本亲善友好，和睦相处，平等相待，而这只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初衷是想收回中国的主权和维护国家的利益，是值得肯定的。而汪精卫所讲的“大亚洲主义”，是在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的领土，东北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的主权被严重侵犯和损害的背景下，此时汪精卫却大肆宣传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中日要积极合作，实践“近卫三原则”，实现“中日亲善合作”，这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认敌为友，是典型的民族投降主义论。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严厉地驳斥。在汪伪政府成立当天，《新华日报》发表吴克坚的长文《斥汪逆精卫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吴克坚认为，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核心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替被压迫民族打不平，而汪精卫却“把‘大亚细亚主义’故意曲解，把亚洲与欧洲对立起来……不去反对日寇而去反对英美”。吴克坚指出这种曲解绝对不是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本意，他认为汪精卫利用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目的是以此作为向日本投降认贼作父的“理论根据”，痛斥汪精卫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曲解为“大亚细亚主义”、把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曲解为“东亚协同体”、“建立东亚新秩序”，认为这种曲解的实质是对日投降主义^③。由此可知，孙中

^① 汪精卫：《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训词》，《行政院公报》1940年第32期，第18页。

^②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第376页。

^③ 吴克坚：《斥汪逆精卫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新华日报》1940年3月30日，第4版。

山的“大亚洲主义”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当然也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它是为了追求国家独立和解放的理论，但汪精卫宣传的“大亚洲主义”是为了配合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论，是为了满足日本的政治和舆论宣传的需要，因此，它完全改变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初衷，纯粹是为了配合日本对外侵略的需要。

1940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五一”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积极利用“五一”劳动节，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揭露汉奸汪精卫反共投降的丑恶嘴脸，“力谋工人组织的团结与统一”^①。可知中国共产党积极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汪精卫的汉奸面目，努力增强工人的抗战意识，积极争取工人的支持。11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认清孙中山先生所指示的‘妥协是我们彻底革命的大错’，严防、打击‘敌人的软化’，反对敌人汉奸和亲日分子”^②。可知，中国共产党强调不能对日本妥协，要严防日本的“软化”政策，坚决抵制汉奸和亲日分子。

在宣传“大亚洲主义”的同时，汪伪政权还通过一系列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一方面来显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来配合“大亚洲主义”的宣传。汪伪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以“双十节”为例，在庆祝“双十节”期间，汪伪政权十分注重仪式的神圣与庄严，比如全体肃立，“恭读总理遗嘱”和“向国父遗像行鞠躬礼”等等，纪念仪式十分严肃庄重。纪念仪式的严肃性和庄重性突显的是仪式的神圣和庄严，更强调的是政权的正统性。这些显示政权正统性的仪式和文化不仅存在于汪伪政权的纪念活动中，而且还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组织民众参加“总理纪念周”、参与“植树节”和参拜中山陵等等，不仅汪伪政府官方会组织大批民众参与这些活动，而且民间也有一些人自发的参与纪念活动。除了这些纪念活动外，汪伪还积极借用和改造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内涵的争议性和模糊性，为汪伪的牵强附会和过度延伸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汪精卫在纪念1940年“双十节”时说，中日团结发展，不仅可以完成“国家建设”，而且可以借此实现“总理的大亚洲主义”。在1941年的“双十节”庆祝活动，汪精卫发表了《三十年国庆日致辞》的讲话，他说：“和平反共建国运动与革命运动是一脉相承的。革命运动，其目的在解除帝国主义之压迫，自拔于次殖民地的地位，而以改造政治为着手。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1939-1940），第367页。

^②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新华日报》（重庆）1940年11月12日，第1版。

救国所以兴亚，兴亚所以救国，两件事是一件事，和平反共建国运动亦然”，汪精卫进一步强调“认识日本所提倡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真正意义，知道惟有与日本同心协力，乃能保得住东亚，东亚保得住，中国才保得住”^①。在这里可知，汪精卫认为日本提倡“东亚新秩序”是为了保住东亚，也是为了帮助中国获得独立与自由，所以我们必须与日本合作，要与日本同心协力才能救国。为了纪念1941年的“双十节”，汪伪南京市市长蔡培在《大亚洲主义》上发表《怎样纪念民国三十年的双十节》一文，文章指出“列国之中对于中国具有决定的影响力的，只有邻邦日本。因此国父曾说‘中国革命之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应该根据国父大亚洲主义的遗训，重新确立善邻友好的外交方针……使中国的复兴和日本的发展利害一致，进而共同努力与新东亚之建设”，蔡培还希望“全国同胞在庆祝本届双十节的时候，不要忘了孔子‘三十而立’这句话，尤其不要忘了国父的大亚洲主义的遗训”^②，由此可知，汪伪的“双十节”不仅开展纪念活动，还积极宣传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以配合日本的新东亚建设。而在1943年“双十节”纪念活动中，汪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发表讲话说：“这次中国参加大东亚战争的意义和事实，和第一次参与欧战，截然不同，我们不但自身求得解放，并且也替东亚全民族求得解放……中国参加大东亚战争是实现大亚洲主义”^③，在1944年“双十节”庆祝活动，陈公博宣读训词：“大东亚战争，实具有所谓解放东亚民族之大义名分，同时亦系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羁绊之千载一时之良机……大亚洲主义，乃救中国与保东亚之最高原则……我们必须充分对国父所指示之国民革命方针，加以充分认识，必须觉悟此乃救中国与保东亚之唯一大道”^④。汪精卫把“大亚洲主义”阐释为是为了实现“中日亲善”和“中日合作”，通过把“和平运动”与日本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相互勾连起来，以实现东亚和平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由此可知，汪伪政府高官都积极把“双十节”庆祝活动与宣传“大亚洲主义”结合起来，还与“大东亚战争”相配合，以满足汪伪政权的理论需要和日本的政治需要。

第二节 配合日本的舆论宣传

（一）对“东亚新秩序”和“近卫三原则”的配合

^① 汪精卫：《三十年国庆日致辞》，《大亚洲主义》1941年第3卷第4期，第1-2页。

^② 蔡培：《怎样纪念民国三十年的双十节》，《大亚洲主义》1941年第3卷第4期，第17页。

^③ 《国民应加倍努力——卅二年国庆日陈市长广播词》，《申报》1943年10月10日，第1版。

^④ 《国庆纪念典礼：陈代主席宣读训词》，《申报》1944年10月12日，第2版。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说“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①。由此可知，日本政府开始由“武力侵华”转变为“武力与政治诱降并行”，积极诱降和蛊惑中国的“有识之士”，蛊惑他们一起建设“东亚新秩序”。同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在“艳电”中认为“近卫三原则”是为了帮助中日实现和平的原则，他说：“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②，随后也积极响应和配合日本政府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

1939年10月，汪精卫发表《中国与东亚》一文，指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其一在排斥侵略主义，又其一在排除共产主义，侵略主义来自西洋……共产主义亦由西洋而来，其阶级斗争之说，欲使中国人互相杀戮”^③。汪精卫认为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中国要想消除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得到日本的支持与帮助，所以汪精卫又接着说：“日本在东亚为先进国，改造东亚日本有领导之权利及义务，此中国人能知者。中国在东亚，为地大人众、历史悠久之国，改造东亚，中国有分担责任之义务……中国之所忧者，在如何实现分担责任之能力，换言之，中国若灭亡，固无分担责任之可言，假使不灭亡，而主权若受掣肘，独立自由不完全，实现分担责任之能力亦薄弱，中国之求生存，求独立自由，固为中国自身计，同时亦为东亚计”^④。因此，汪精卫认为日本应积极帮助中国实现独立与自由，并再三强调日本对于东亚的指导地位。对于东亚，日本是先进国，有指导东亚的权利和义务，东亚各国为了实现自由和独立必须接受日本的指导。由此也可知，汪精卫反对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并认为西方列强是侵略者，而认为日本是东亚的先进国，是来帮助东亚各国获得独立与自由的，因此东亚各国为了实现自由和独立必须接受日本的指导，和日本一起建设“东亚新秩序”。

为了进一步迎合日本对外侵略的需要，汪精卫把“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原则都说成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⑤。通过这种解释，汪精卫把他宣传的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和“近卫三原则”强行勾连起来，最终都体现在“近卫三原则”中。

根据汪精卫对“近卫三原则”的解释和他与日本所签订的《日华基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403页。

^② 汪精卫：《艳电》，《南华日报》1938年12月29日，第1版。

^③ 汪精卫：《中国与东亚》，《华南公论》1939年第1卷，第25页。

^④ 汪精卫：《中国与东亚》，《华南公论》1939年第1卷，第25-26页。

^⑤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三民周刊》1940年第2卷第1期，第46页。

本关系条约》的内容来看，日本一方面想巩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想支配中国的主权。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日本提出了“经济提携”，要求中国把资源、贸易等交给日本掌控，就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战略物资基地。为了支配中国的主权，日本提出了“善邻友好”和“共同防共”。“善邻友好”是指日“满”华三国友好，要求中国严禁一切抗日活动，同时中国的各方面建设都需要雇佣日籍顾问，企图用日籍顾问控制或监视中国的建设。所谓“共同防共”，就是共同反对共产国际。为了防共，日本要求在中国驻军，但日军的这种要求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由此可知，日本提出“善邻友好”和“共同防共”，既是想汪伪政权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承认其独立的事实，又想控制中国的政治、外交、贸易和领土等主权。因此，日本提出“近卫三原则”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其对外侵略中国的需要。

为了迎合“东亚新秩序”和“近卫三原则”，汪精卫所阐述的“大亚洲主义”，不仅完全漠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而且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说成是践行“东亚新秩序”和“近卫三原则”，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国和殖民地，汪精卫宣传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本意毫无关系，它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地恶意篡改和强行歪曲，是为了通过将“大亚洲主义”和“东亚新秩序”、“近卫三原则”强行联系起来，以此来美化日本的侵略，迷惑中国民众。

对于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进行了严厉地驳斥，王宠惠首先支持和肯定了蒋介石在《严正驳斥近卫声明》里的主张，他说：“我们的蒋委员长曾在同月二十六日以严正的词句，揭穿近卫的阴谋，说明这个‘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是敌人的阴谋”。其次，他从国际公约的角度来驳斥“东亚新秩序”，他说：“就国际条约来讲，敌人的‘东亚新秩序’是违背国际信义和胆大妄为的阴谋……1922年华盛顿会议，为谋太平洋区域的和平，曾经特别签订一部九国公约。九国公约里面包含两大原则，一是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一是门户开放……日本是九国公约的签字国之一，而且是完全自由出于己意自动签字的……日本的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日本不知悔悟，反而变本加厉……于是英法美三国政府先后致牒抗议”，由此可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实际上破坏中国的独立和完整，破坏了《九国公约》，打破了太平洋区域的安宁秩序。最后，他得出结论：“日本的军事侵略，是为的实现它所标榜的‘东亚新秩序’，而所谓‘东亚新秩序’，

实质上是‘吞并中国,独霸亚洲’”^①。他看到了“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因此他认为对于日本的侵略,我们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为了人道正义起而抗战,是正当的,必须抗战到底。1940年3月,《救亡日报》发表社评《汪逆贼心不死》,再次猛烈抨击汪精卫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第一是公然曲解总理救国主张,丧心病狂的说中国之存在一定需要日寇之协力,接着依旧是恭维日寇近卫宣言,硬说日本不欲灭亡中国”^②,认为汪伪的《宣言》是对总理救国主张的恶意篡改,其目的是迎合“近卫三原则”。国共对于“东亚新秩序”和“近卫三原则”进行了坚决地驳斥,对于汪精卫的妥协和迎合也进行了猛烈地批评,这些驳斥和批评,有利于帮助普通民众增强辨别和抗战意识。

(二) 对“东亚联盟”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迎合

1939年,石原莞尔在《东亚联盟建设纲领》中提出了“东亚联盟”论。“东亚联盟”主张在日本天皇指引下,建立以日“满”华为核心的亚洲联盟,从而达到日本称霸亚洲的目标。随后,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宣告成立,该协会把“近卫三原则”与“东亚联盟”的思想结合起来,大力宣传“近卫三原则”,鼓吹亚洲各国一起建设“东亚联盟”。1940年5月,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的要求和支持下,汪伪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缪斌在北平成立了“中国东亚同盟协会”。1940年11月,汪精卫在《中央导报》上发表《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一文,指出孙中山曾经说要联合平等对待中国的民族,而汪精卫声称“如果日本以平等待我,正是‘大亚洲主义’所期望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联合”二字对于落后而企图复兴的国家,尤为必要,并认为“大亚洲主义就是从此而来的……中日两国在反省之后,进行联合,同时努力”。汪精卫认为日本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中国要与日本“同时努力”,他说:“世界大势……由一国单独行动进入集团行动”^③,而他这里所谓的“同时努力”,实际上是要求中国积极配合日本,停止抗战,与日本一起共同建设“东亚联盟”。11月25日,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周化人在南京发起成立“东亚同盟中国同志协会”,“东亚联盟”运动在沦陷区广泛开展。在沦陷区的其他党派、团体和各地的“东亚联盟”运动,如“中华民国共和党”、“中国大民会”及“兴亚建国运动”等等,最后都合并于汪伪政府。1941年2月,“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汪伪政府开始统一指挥沦陷区的“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为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撰写训词,说“大亚洲主义是东亚联盟之根

^① 《驳斥敌方“东亚新秩序”谬说》,《中央日报》(重庆)1939年3月9日,第4版。

^② 《汪逆贼心不死》,《救亡日报》1940年3月15日,第2版。

^③ 汪精卫:《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中央导报》(南京)1940年第1卷第15期,第2页。

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之具体实现”^①。由此可知，汪精卫通过把“大亚洲主义”和“东亚联盟”强行勾连起来，以此来积极配合日本宣传的“东亚联盟”。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纲领是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②，汪伪极力向民众阐述“政治独立”的重要性的意义，汪伪认为东亚联盟是一个以精神联结为基础的联盟，不是一个以政治联结为目的的联盟，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思想联盟，各国的政治都是独立的，所以汪伪说“吾人何故以政治独立为先……盖政治不能独立……而平等互惠自由合作必无从说起”^③，汪伪企图向民众宣扬“东亚联盟”不是政治联盟，是不依靠日本的，也不受日本领导，各国的政治都是独立的，并说“东亚联盟”的基础是“政治独立”。汪伪企图用这种偷换概念的方式来缓解民众的抗日情绪，为“东亚联盟”运动扫清障碍，但事实证明这种欺骗的伎俩，注定是徒劳的。

汪伪还认为“中日联盟运动，就是东亚联盟运动，东亚联盟运动，也就是大亚洲主义运动的初步”^④，并指出“中国革命，应当在这种东亚联盟的认识上……这是中国第三次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意义”^⑤，汪伪通过把“东亚联盟”运动与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强行勾连起来，使“东亚联盟”运动披上了“第三次国民革命运动”的外衣，还认为这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其目的就是让“东亚联盟”运动能够“合法合理”的在中国开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汪伪政府立马配合，立即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进行改造。汪伪政府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说成是积极实践“大亚洲主义”，认为“大亚洲主义是东亚民族革命之指导原理，东方民族对抗外来侵略主义之自卫手段”^⑥。汪伪政府还指出“大亚洲主义”是亚洲受压迫国家拿来对抗西方侵略主义的武器，而日本在太平洋上对英美宣战，使得“大亚洲主义，已经由理论时代而进入实行时代”^⑦。汪伪政府通过这样的解释和阐述，经过改造后的“大亚洲主义”完全满足和适应了“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需要。

而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情况，汪伪却不断掩饰和美化，在1944

^① 汪精卫：《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训词》，《行政院公报》1940年第32期，第18页。

^②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会章》，《政治月刊》（上海）1941年第1卷第2期，第35页。

^③ 《中华东亚联盟协会成立宣言》，《大亚洲主义》1940年第1卷第3期，第160页。

^④ 马骏名：《大亚洲主义的理论和实际》，《建军月刊》1944年第20-21期，第13页。

^⑤ 缪斌：《中国第三国民革命论》，《东亚联盟》1940年第1卷第2期，第8页。

^⑥ 周化人：《肃清西洋思想的余毒》，《大亚洲主义》1940年第4卷第4期，第45页。

^⑦ 汪精卫：《大东亚解放战》，《政治月刊》（上海）1942年第3卷第1期，第5页。

年的“双十节”庆祝活动中，汪伪控制下的《申报》发表社评《国庆日的愿望》，声称“没有国家观念的人，也决不会明白大东亚的重要，也就不能明白解放战争的重要。可是，大东亚战争已是决定大东亚各国家民族的命运战争”。而在对盟邦日本的愿望中，汪伪政府极尽谄媚之词，说“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即无日本，已经为中日两国有识之士所共识。日本对华新政策以及大东亚共荣圈新秩序之意义，必须使中国人民普遍了解……我们更认为军事政治经济三者并重，中国方面要以极诚恳的态度，共同应付决战局面”^①。由此可知，汪伪政府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关乎亚洲各民族前途的决定性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支持日本，共同应付决战局面。但汪伪政府大肆宣传“黄色人种革命”和支持“大东亚战争”，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亚洲各国家的自由与独立，而是一味配合日本的对外侵略和满足日本的政治和舆论需要。在这里，汪精卫通过宣传“黄色人种革命”和支持“大东亚战争”，达到了为日本对外侵略政策辩护的目的。汪伪宣传的“大亚洲主义”主要是为了配合和满足日本的侵略需要，以求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而孙中山宣扬“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和亚洲被压迫的民族国家，能够获得政治独立，民族解放，同时废除不平等条约，都成为独立的国家，“要做亚洲的主人翁……大亚洲主义……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的问题”^②。但汪精卫所宣传的“大亚洲主义”，是要亚洲各民族国家都参加日本的“东亚联盟”，以日本为亚洲的霸主，配合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最后都沦为被日本压迫和殖民的国家。

经过汪伪政府对“大亚洲主义”的不断篡改，其不仅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初衷与本意，还把“东亚联盟”运动和“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当成了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践。在“大亚洲主义”的旗帜下，“东亚联盟”运动和“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达到了配合日本政治宣传的需要。

综上所述，汪伪政府成立后卖力的宣传“大亚洲主义”一方面是为了使“大亚洲主义”成为自己建立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日本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宣称要和日本一起实践“大亚洲主义”。

^① 《国庆日的愿望》，《申报》1944年10月10日，第1版。

^②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2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亚洲主义”进入实行阶段

汪伪政权成立后，积极阐释“大亚洲主义”，积极响应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和“东亚联盟”，并认为“东亚联盟是对大亚洲主义的实现”，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战争形势风云突变，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需要，汪伪政府对“大亚洲主义”的阐释也发生较大变化，积极鼓吹“大亚洲主义”由理论阶段进入实行阶段。

第一节 “大亚洲主义”由理论阶段进入实行阶段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积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在日本的要求和支持下，1943年1月，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声称“大东亚战争是对大亚洲主义的实践”。汪精卫在《告将士书》中说：“国府已正式宣布参加大东亚战争，与友邦日本签订中日共同宣言，表明为完遂对英美共同战争……两国……作完全之协力，同时并签订关于交还租界暨撤废治外法权等之协议。国父积四十年之努力，从事革命，所渴望废除不平等条约，载诸临终遗嘱之一语，至于今日，幸见实现……国父在时，会昭示吾人欲图复兴中国、保卫东亚，惟有实行三民主义及大亚洲主义。国父自始即深知中国欲求自由平等之获得，必有待于东亚民族整个之解放。兹国民政府，毅然宣布参加大东亚战争，即为实现国父大亚洲主义热烈之期望，此实为历史所赋予吾人之伟大使命也”^①。由此可知，汪伪认为参加“大东亚战争”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是实践“大亚洲主义”，这是强行把“大东亚战争”与“大亚洲主义”联系起来，汪伪改造和阐释“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迎合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论”。

汪伪政府认为日本在太平洋上对英美宣战，使得“大亚洲主义，已经由理论时代而进入实行时代”^②。汪伪政府还把“大东亚战争”认为是东方有色人种与西方白色人种之间的战争，是黄种人推翻白种人殖民统治的革命，于是汪伪政府大肆宣传“黄色人种革命”，指出：“百年以来英美两国挟其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双方并进之国策……亚洲的黄种，亦受其厄运。自从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东亚共荣圈等口号，东亚诸

^① 《军事委员会——汪委员长告将士书》，《申报》1943年1月19日，第2版。

^② 汪精卫：《大东亚解放战》，《政治月刊》（上海）1942年第3卷第1期，第5页。

民族……向着共存共荣的将来，致其最大的努力”^①，由此可知，汪伪认为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正是为了把黄色人种从西方白色人种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帮助亚洲各受压迫民族和国家实现自由与独立，这也正是总理“大亚洲主义”所期望的，所以说“大东亚战争是对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实践”，在日本的努力下，“大亚洲主义”已经从理论思想阶段进入到具体实践阶段。因此，汪伪政府大肆宣传“黄色人种革命”，从思想和舆论宣传上支持“大东亚战争”。

汪伪政府参战之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日本要求和帮助之下，先后颁布了多项政令，把政府体制全面转向“战时体制”。日本一边要求汪伪政府强化对沦陷区民众的控制和奴化教育，另一边要求汪伪政府“实现积极的对日合作”。《解放日报》对此发出评论，认为这是让日本从中国掠夺更多的战略物资，从而“把沦陷区的政治与经济完全适合于日本的需要”^②，以期持续贯彻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对于日本建设的“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抗日刊物《国民前导》评论说：“汪逆精卫背叛祖国……窃取总理遗教，抹杀真理，曲解原意，借为护符。其最无耻荒谬的一点，是说敌寇‘建设东亚新秩序之意义，尽与总理的大亚细亚主义全然一致’。因此而颀颜推论出其现在的亲日卖国……这不是以猎犬的丑态为敌寇狂吠……混淆黑白，此诚不得不费词一斥”^③。对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的行为，1943年1月11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斥汪贼诸逆！并论日寇命傀儡参战的用意》，分析了日本让汪伪政府参战的用意，说：“汪逆之于日寇，过去只是傀儡，现在则是正名定分为盟邦”，抬高汪伪的身份使之心甘情愿的参加战争，还指出汪伪参战对日寇的四大作用，一是汪伪既与英美宣战，就需要投入所有物力人力参与战争，可以支援日军的后勤。二是把汪伪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对立起来，把沦陷区人民与后方同胞对立起来。三是把汪伪军队用来作战或者守备，以便日军抽调兵力。四是“日寇在这时裹胁汪傀儡参战，以大举的掠夺我沦陷区的人力与资源，可能是在筹备一个新的战争”，评论还指出汪伪显然明知日军的险恶用心，却完全忽视，痛斥“汪贼一向是日寇的走狗，现在又想作看门狗”，最后一定是“日寇切腹刀旁的伴死狗”^④。蒋介石政府严厉抨击了汪伪政府参加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指出这是汪伪政府

^① 汪精卫：《扫除英美的流毒》，《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南京：汪伪中央宣传部，1942年，第359-360页。

^② 《评汪伪对英美宣战》，《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月13日，第1版。

^③ 单鸣皋：《斥汪贼精卫曲解总理遗教的无耻妖言：关于大亚细亚主义》，《国民前导》1941年第2期，第18页。

^④ 《斥汪贼诸逆！并论日寇命傀儡参战的用意》，《大公报》（重庆）1943年1月11日，第2版。

在日本的要求和支持下，帮助日本持续贯彻“大东亚圣战”，蒋介石重庆政府评论称“妄想奉献中国沦陷区内的人力物力作为他主子续命的供词”，还说“日本是破坏世界和平的始作俑者，汪伪是破坏世界和平的鹰犬，因此，我们应尽快把寇伪摧毁”^①。

1943年8月7日，《民族正气》发表了涂道坦的《驳斥汪逆精卫之汉奸理论》一文，涂道坦指出国父在“大亚洲主义”讲演中特别慎重的警告日本国民，提醒他们要谨慎选择，但“现在的日本，不就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吗？做侵略强盗首领希特勒的帮凶吗！国府对日本看得非常透澈的”，而汪伪政府一味附和日本，甚至在日本的怂恿下对英美宣战。涂道坦严厉驳斥了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的文告，说“文中夸耀敌寇在太平洋之胜利，公然承认‘满洲国’之存在，且强调‘日’‘满’‘支’，携手合作为中国复兴之必要……汪逆之卖国行为，罪恶昭彰，无庸再述，然其盗用国父之遗训与曲解国父之遗教，实属无耻已极……他这种盗用及曲解国父遗教的技巧是非常幼稚而荒谬的，他只能哄骗那些利令智昏的大小汉奸们，以及毫无智识的民众”。涂道坦认为汪精卫盗用和曲解“国父”遗教的行为，虽然手段低劣，只能欺骗贪图名利和毫无智识的民众，但必须对汪精卫的行为进行揭露，以正视听。他还说我们要研究国父的“大亚洲主义”就要先注意国父“大亚洲主义”讲演的时间、地点、听讲者以及当时的情势，然后再研究这篇讲词的内容，他认为“循着这个步骤去研究，就可得到正确的认识”，最后分析得出：“国父的‘大亚洲主义’纯粹是研究东方文化之本质而定的名词，绝对没有带上一地域性或联盟性以及集团主义的色彩，与‘门罗主义’、‘东亚共荣圈’、‘亚洲大同盟’这些名词不一样”，并指出：“汪逆所谓的‘大亚洲主义’，实际上是投降主义，向敌人摇尾乞怜以求维持个人地位利益的卖国主义。强盗窃贼奴才主子联合趁火打劫的‘东亚大同盟’，以日本为全亚洲之主人而以其他民族供其奴役的‘东亚共荣圈’，就是敌寇与汪逆同声唱和的‘大亚洲主义’的内容”^②。在孙中山提倡“大亚洲主义”时，日本国内也在盛行着一种“大亚细亚主义”，但这两种主义大相径庭，日本人中野正刚曾说：“孙君所讲的，与日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的立论全然歧义，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联合亚细亚，从人种皮肤颜色上与白人应战，而又以日本为中心，对抗白人的帝国主义，有重新造成另外一个别开生面的帝国主义倾向。在相反方面，孙君却不过只反抗以英美为执牛耳的霸者的帝国主义，故主张先联合被白人帝国主义所扰害的亚细亚诸民族，

^① 《势必殉葬的傀儡》，《中央日报》1943年3月16日，第3版。

^② 涂道坦：《驳斥汪逆精卫之汉奸理论》，《民族正气》1943年第1卷第2期，第54-58页。

此种主张是根据‘世界大同’的思想而演出的解放战争”，并认为“大亚洲主义的真精神……是联合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自主……自大东亚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大民族为了在亚洲共同的命运，才发生彻底的觉悟，开始联合起来，结成同一的战线，立于反英美帝国主义的阵头”^①。江鸟本想引用中野正刚的话来强调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为了联合日本一起反抗欧美帝国主义，但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得知，中野正刚认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为了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这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完全不同，由此暴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更从侧面证明了汪伪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歪曲是有多么荒谬。

汪伪政府还把“大东亚战争”强行阐释为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践”，汪伪改造“大亚洲主义”主要是为了迎合日本宣传的“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使日本的对外侵略显得更加冠冕堂皇和“合理化”，因此汪伪政权参加“大东亚战争”的实质是支持日本的对外侵略，为日本贯彻“大东亚圣战”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配合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日本实行“对华新政策”的根本目的是把中国沦陷区变成日本的战略物资基地，掠夺沦陷区人力与资源，以支持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因此，“大东亚圣战”和“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日本侵占东亚各国，把东亚各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和战略物资基地，而此后日本交还租界和放弃治外法权只是为了争取东亚各国支持“大东亚战争”的一种政治手段。

第二节 汪伪政府收回租界与废除不平等条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后攻占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租界，打着实践“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宣传打倒欧美列强，号召“解放大东亚”，以此来争取沦陷区的中国民众。日军的这种宣传，让汪伪政权误以为可以收回租界了，便开始不断与日军进行交涉，要求收回租界，但被日军拒绝。

1942年6月7日，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逐渐失去了在太平洋上的优势地位。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为了争取汪伪政权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战略物资，日军开始改变对华政策。同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对华新政策”。这一政策其中就谈到了租界问题，宣称：“对于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殊权益，应以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为基础，设法尽速予以撤销，或者予以调整……

^① 江鸟：《大亚洲主义的真精神》，《东亚联盟》1944年第7卷第3-4期，第11-14页。

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在各方面广收人心”^①。这里的“国民政府”是指汪伪政府，由此可知，日本政府的“对华新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汪伪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争取民心，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汪伪政府支持大东亚战争。1943年1月，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说：“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以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还说“凡吾国民，当知此为实实现国父大亚洲主义之唯一时机”^②，对于汪伪政府的参战，《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因国民政府参加大东亚战争和日本树立新的对华政策，相信中国便可向着敬仰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毕生宏愿之大亚洲主义的实现，中国复兴，新中国的建设，大踏步前进”^③，由此可知，日本舆论认为汪伪政府参加大东亚战争是在实践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同年2月17日，日本报道部长佐藤贤了发表演讲说：“当大东亚战争之今日，帝国即须举全大东亚之民族，以所有之资源，集中于贯彻战争之一途……加强国府之政治力……以期贯彻圣战”^④，可见，贯彻“大东亚圣战”才是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的根本原因。

汪伪政府在日本的帮助下，收回了沦陷区的大部分租界，也废除了治外法权，其中尤以上海公共租界最为重要，着重阐述一下。1943年6月，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大使”谷正之签订《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规定汪伪于8月1日接收公共租界，但日本基于上海地位的特殊性，做了很多特别规定，如公共租界内财产物资应暂时维持现状、上海市8个警察局副局长都由日本人担任、上海市政府需雇佣日籍经济和技术顾问等^⑤，可知，日本虽然表面上把上海租界交还给汪伪政府，但“口惠而实不至”，租界内的实际权益仍由日方掌控。即使如此，汪伪政府还是欣然接受，褚民谊还致电重光葵说，上海公共租界是英美侵略中国的最大堡垒，这次收回租界，驱逐了租界里的英美势力，有利于实现中国的自由和独立，也有利于中国参与大东亚战争，同时他还感谢日本帮助中国收回租界^⑥。同日，陈公博发表《告上海市民书》，称：“上海公共租界的收回……廓清英美的残余势力”^⑦，足以表明日本政府的诚意。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580-581页。

^② 汪精卫：《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布告》，《东亚联盟》1943年第3卷第1期，第4页。

^③ 《中国政府之对英美宣战》，《朝日新闻》1943年1月10号。

^④ 黄和材：《日寇“对华新政策”分析》，《新中华》复刊1944年第2卷第1期，第40页。

^⑤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北京：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92页。

^⑥ 东洋文库藏：《汪伪政府驻日本“大使馆”档案》，转引自石源华：《汪伪政府“收回”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述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20页。

^⑦ 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第98页。

1943年8月，汪伪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汪精卫发表讲话说：“我们今日庆祝上海租界收回，不是庆祝中国独立自主的完成，而是庆祝中国得此凭籍，可以发展力量，以实现国父大亚洲主义之遗教”^①，可知，汪精卫认为收回租界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践，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教。而日本全权公使田尻爱义说：“租界之交还决非宣传国府强化之政治的手段，乃为以大东亚之兴隆为目标……且中国已对英美宣战，真爱中国者必欣然归附于孙中山先生所主张之大亚细亚主义，且不惜牺牲，敢然以救济及建设大东亚为目标，由各方面确立总力战的战时体制，以建设适应大东亚新秩序之新国家”^②，汪伪和日本政府都认为收回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是实践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也是在实现孙中山的遗教，通过这种宣传，借以拉拢和争取中国民众，以提高汪伪政府的政治影响力，同时宣扬汪伪政府在中国的“正统”地位。

在1944年的“国父诞辰纪念日”，时任《申报》社长陈彬龢发表演讲，说：“大东亚战争发生以后，中国对英美宣战，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经日本的竭诚协力，始将各国所有在中国的租界，一律交还，并撤销领事裁判权……对于国父所念念不忘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终于实现……其次自从中国参加大东亚战争以后，中日两国缔结同盟……其后盟邦更发起大东亚各国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更确定了东亚各国家的互惠平等与共存共荣，迄今更实现了国父的大亚洲主义，相信国父在天之灵也必引为欣慰的”^③。可知，他认为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帮助中国收回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践，企图用这种宣传来迷惑沦陷区的人心，蛊惑沦陷区民众支持“大东亚战争”。对于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态度鲜明，他说：“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④。在“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他主张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要与日本进行联合，但这是有前提的，即“若是日本真有诚意来和中国亲善。便先要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的条约”^⑤，由此可知，日本帮助中国实现自由与独立，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中日友好的前提，而汪精卫把“大亚洲主义”改造为与日本的“亲善友好”是无条件的，是没有限制的，完全忽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大片中国国土，

^① 《汪主席训词》，《申报》1943年8月2日，第3版。

^② 《上海公共租界交还后感想》，《申报》1943年8月2日，第3版。

^③ 《昨国父诞辰日，全市扩大纪念》，《申报》1944年11月13日，第3版。

^④ 孙中山：《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33页。

^⑤ 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第431页。

把孙中山说的“始终期望日本与中国，彼此要做朋友，不要做敌人”^①过度延伸，汪精卫还认为就算日本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也要本着“冤仇易解不易结”的精神，以卖国求荣来换取日本的“亲善”，这是典型的民族投降主义，这样的“亲善”完全忽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卖国投降的“亲善”。通过分析汪伪政府收回的租界分布地点，不难发现汪伪政府收回的租界都是在沦陷区内，而此时英美势力在沦陷区内并不能发挥多大影响，而且租界内的经济命脉仍由日本控制，也就是说汪伪收回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实际上只有政治效果，只是为了政治宣传，获得的实际利益并不多，所以汪伪政府这些收回租界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为一般都被当成是一场“政治作秀”，不过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提及1943年中国的废约运动时指出：“因为早在1942年8月29日，在‘江宁条约百年纪念会’上，汪精卫就说已将英美驱逐，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因为汉奸都先发制人如此，所以10月6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就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尔基来中国时候，呼吁赶快跟进”^②。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对新约一再拖搁，以致寇伪先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宣传计划大受影响，殊为遗憾”^③，由此可知，汪伪政府与日本政府在签订废约的时间上早于蒋介石和英美，这使得蒋介石对此颇感遗憾。

综上所述，“大东亚战争”和汪伪废约运动可以说是一对因果关系，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因，汪伪“废约”是果。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对英美宣战，占领英美在华租界，而日本要持续贯彻“大东亚战争”就需要争取汪伪政府更多更大的支持，特别是经济上和战略物资上的支持，想要得到汪伪的支持，就需要给予汪伪政治利益，而交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不仅是给予汪伪的最大好处，最大的政治利益，而且对于日本自身并未有任何大的损害，又可以提升汪伪的政治影响力，向国际社会显示汪伪的“正统地位，可谓一举多得！汪伪得到“收回租界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好处，必然会对日本感恩戴德，从而积极全力支持日本的“大东亚战争”，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汪伪不仅对英美宣战，还加强了对民众的压榨，搜刮民脂民膏，以支持“大东亚战争”。

^① 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页。

^② 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第68页。

^③ 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43年1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第11页。

结 语

从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到1945年8月汪伪政府垮台，汪伪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宣传“大亚洲主义”，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主旨是“推行王道文化，反对霸道文化，替被压迫民族打不平，实现亚洲各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总结起来就是三点，第一，推行我们的王道文化，以排除霸道文化；第二，推行我们主张的平等解放运动，以打倒功利思想；第三是把亚洲受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争取自由平等，再为世界各洲受压迫的民族打不平。“大亚洲主义”它不但是解放亚洲民族的先声，而且有实现世界大同的意义。而汪伪宣传的“大亚洲主义”与此根本不同，汪伪宣传“大亚洲主义”的主要内容随着日本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既满足自身的政治诉求，又满足和配合了日本美化对外侵略的需要，汪伪宣传“大亚洲主义”的方式是一方面大力宣传重庆蒋介石政府受英美和共产主义蛊惑，坚持焦土抗战，毁国毁民，会导致“亡国灭种”。另一方面说自己为了避免“亡国灭种”，所以公开呼吁“和平运动”，宣传英美是侵略者，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和“东亚联盟”是日本帮助中国一起反抗英美帝国主义。

汪伪宣传“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是通过种种方式来为自己的“和平运动”找到“合理化”依据，更主要的是配合日本的舆论宣传，美化日本的对外侵略，是典型的民族投降主义理论。汪伪通过不断地恶意歪曲和延伸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以配合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和“东亚联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配合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汪伪把日本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认为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实践，这是一种强行的歪曲和延伸。很明显，孙中山宣传的是以王道文化为基础的“大亚洲主义”，而汪伪和日本所宣传的是以霸道文化为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汪伪的种种行径遭到了国共两党的猛烈抨击，历史证明，汪伪的种种宣传，终究是一场“闹剧”。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去世。11月13日，《中央日报》发表短评《死有余辜的汪逆》，说：“出卖民族认贼作父的汪逆，现在是死了”^①，但在“我们民族史上留下了一个的污点，政治上也多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奸逆”，但汪逆的死亡，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其一，凡是看不见自己国家民族的力量而甘为奴隶傀儡的奸逆，其人格其理论在国人之前必然宣告破产……其二，凡是以汉

^① 《死有余辜的汪逆》，《中央日报》（重庆）1943年11月13日，第3版。

奸傀儡姿态出现，岗位吞并我国家民族的侵略者作爪牙的，都绝不能成事，都等于自杀”^①，还预测了汪伪政权即将崩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6日，陈公博召开伪中央政府临时会议，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陈公博在《国民政府解散宣言》中，还美其名曰说：“今则世界已恢复和平，中日亦消除战祸，虽和平之方式与当日致力者不同，而国家之独立自由，与全国人民所希望者并无异致”，所以陈公博说：“吾人之使命，亦已告终，即日宣告解散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早日统一，民族得以早日复兴，庶无负六年来国民政府坚忍负重之初衷，亦无负国民政府与人民含辛茹苦之奋斗也”^②，由此可知，陈公博认为现在中日已无战事，实现和平，虽然和当初他们希望实现和平的方式不一样，并且认为他们“和平运动”的方式是“坚忍负重”，但他认为两种方式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与统一，现在目的达到了，他们的使命完成了，所以才宣布解散汪伪政府，陈公博和汪伪政府希望通过这样“体面”的方式来解散汪伪政府，妄图狡辩和掩盖他们的卖国罪行，但这样幼稚的手段和方式，不仅不能欺骗中国民众，而且遭到了人们的唾弃。

颇令人玩味的是，8月15日，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后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说：“……我说到这里，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③。可见，蒋介石强调对待日本要不记仇，要友善对待日本，可以说他在战后处理日本的问题上是极度宽容的，尤其是在处理日本战犯和战后赔偿问题上甚至是纵容的，比如冈村宁次等罪恶滔天的战犯竟被“无罪释放”，然后被送回日本，蒋介石政府也放弃了大部分战争赔偿。这次讲话被日本人称之为是“以德报怨”的讲话，日本人对蒋介石感恩戴德。

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准备内战的需要，蒋介石在日本战败后，对日本的政策是宽容的。在国民政府中负责对日关系的张群，曾回忆说日本人曾高度评价蒋介石，说“蒋总统继承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主张，是具有先见和远见而实行中日亲善合作最有力的人”^④。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通过分析当时中日两国的实力变化，可以得知，日本是战败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中国是战胜国。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按

^① 《死有余辜的汪逆》，《中央日报》（重庆）1943年11月13日，第3版。

^② 《国民政府解散宣言》，《海报》1945年8月17日，第1版。

^③ 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8年，第1515页。

^④ 张群口述、陈香梅整理：《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19页。

照此时日本人的理解，“大亚洲主义”是强者对弱者友好宽容，而不是恃强凌弱，因此当日本战败后，中国虽然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但仍对处于相对弱势的日本相当宽容，中国恃强而不凌弱，所以日本人此时说蒋介石是实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最有力之人。连日本人都认为“大亚洲主义”是强者对弱者要友好宽容，而不是恃强凌弱，这与抗战时汪伪政权所宣传的“大亚洲主义”完全不同，更从侧面证明了汪伪宣传的“大亚洲主义”是多么荒谬和无理。汪伪政府倒台后，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和利用也随之瓦解，灰飞烟灭。

通过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其主旨在于复兴亚洲文化、期望中日合作和反对帝国主义。而通过分析抗战前国内外人士对“大亚洲主义”思想的阐释，可以发现由于其较大的包容性和可伸缩性，他们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纷纷对“大亚洲主义”进行了加工与改造，这对于认识和研究汪伪政权如何解读“大亚洲主义”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而透过汪精卫在其政权成立前后对“大亚洲主义”思想的态度和阐释，可以了解到其前后态度的变化原因有二，一是为自己的“和平运动”寻找理论性依据，二是为了配合日本的政治和舆论宣传需要。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汪精卫从开始宣传“和平运动”到最后去世，都认为他的“和平运动”不是卖国运动，相反是“救国运动”，是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免于被灭亡。汪精卫提出“就中国来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就东亚来说，三民主义也就是大亚洲主义”^①。紧接着，他将“总理遗嘱”也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总理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指所有一切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日本，如果日本能够平等对待中国，有利于和中国一起实现“大亚洲主义”。汪精卫还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歪曲为“东亚新秩序”，并积极与“东亚联盟”相配合，同时不遗余力地借用孙中山的名号，宣称“我们国父，生平主张中日亲善合作最力，同时亦主张东亚联盟最力……大亚洲主义，是遗教中最宝贵之一部，是东亚民族争取解放之秘籍，东亚联盟运动之推进，就是大亚洲主义思想之实践。大东亚战争之发展，就是大亚洲主义行动的实践，故东亚联盟运动与大东亚战争，可以说是均以大亚洲主义为中心”^②，通过这样的利用和改造，汪精卫形成了一整套配合其“和平运动”和日本对外侵略的理论，他说，为了“和平运动”，我们必须做出一些牺牲，所以他在宣传“大亚洲主义”思想时，虽然有时为了迎合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与“大东亚共荣圈”做了一些改造和延伸，

^① 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三民周刊》1940年第2卷第1期，第45页。

^② 汪精卫：《对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训词》，《行政院公报》1940年第32期，第141页。

但他认为这是为了“和平运动”所必须要做的。第二，汪伪政府宣传“大亚洲主义”主要是随着日本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地改造和歪曲“大亚洲主义”，以配合日本的“东亚新秩序论”、“东亚联盟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同时汪伪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配合日本，比如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开展“清乡运动”和宣布参加大东亚战争等等。第三，汪伪宣传的“大亚洲主义”强调抵御欧美侵略，而对于日本，汪伪不仅忽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而且还极力为日本辩护，其目的是争取日本的支持，配合和美化日本的对外侵略。通过分析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可知孙中山从来没有说要在日本主导下来实现亚洲民族独立和复兴，孙中山一再强调“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①，必须在完全平等的立场进行国家间的合作，而汪伪不仅完全忽视这一点，反而不断美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汪伪政府宣传的“大亚洲主义”完全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恶意歪曲和篡改，通过不断地歪曲和篡改，汪伪政府达到了自身的政治目的，成立了政权，也实现了所谓的“还都南京”和“收回租界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也满足了日本的政治需要。

汪伪政府想要通过承继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以显示其政权的“正统性”，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中民族平等的前提又不利于其政治目的的实现，所以只能通过牵强附会和恶意曲解来重新建构这一理论。或许汪伪政府也认识到了孙中山提倡中日合作的前提是日本要平等待我，要尊重中国的主权，但这种民族平等在现阶段无法实现，在政治利益和现实情况面前，汪伪政府选择了将其搁置和无视。但自从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损害中国主权时，“大亚洲主义”的前提和基础就已经不存在了，更不可能说中国和日本能一起实现“大亚洲主义”。汪伪政府利用和改造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本意没有任何的关系，汪伪宣传的“大亚洲主义”都是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恶意歪曲和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和胡编乱造的伎俩并不能改变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本意，反而只会自取灭亡！

^①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39页。

参考文献

一、文献资料

- [1]少侯编：《汪精卫文选》，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
- [2]方济生：《大亚细亚主义之研究》，北京：东方问题研究会第一支部，1937年。
- [3]周化人：《大亚洲主义纲要》，南京：大亚洲主义月刊社，1940年。
- [4]周化人：《大亚洲主义论》，南京：大亚洲主义月刊社，1940年。
- [5]陆起：《大亚细亚主义的真谛》，上海：正言出版社，1941年。
- [6]汪精卫：《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南京：汪伪中央宣传部，1942年。
- [7]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东京：原书房，1969年。
- [8]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1年。
- [9]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10]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1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984年、1985年、1986年。
-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1939-1940），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 [13]上海档案馆：《日伪上海市政府》，北京：档案出版社，1996年。
- [14]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 [15]蒋介石：《蒋中正日记》，台北：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印，2015年。

二、报刊

- [1]《大亚洲主义》1940-1942年
- [2]《东亚联盟》1940；1943年
- [3]《政治月刊》（上海）1941-1942年
- [4]《三民主义月刊》1933-1936年

- [5]《新亚细亚》1940年
- [6]《申报》1943-1944年
- [7]《中央日报》(重庆)1938-1943年
- [8]《新华日报》1938-1940年

三、专著

- [1]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香港春秋出版社，1964年。
- [2]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 [3]赵军译：《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 [4]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 [5]李台京：《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研究：历史回顾与当代意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
- [6]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 [7]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 [9]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
- [10]贺渊：《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 [11]陈哲夫等主编：《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
- [12]林家有、李明编：《孙中山与世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 [13]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 [14]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
- [15]张军民：《对接与冲突：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 [16]盛邦和：《亚洲认识：中国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四、期刊论文

- [1]蒋翰廷、赵矢元：《略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6期。

- [2] 赵矢元：《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选自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中日关系史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 [3] 石源华：《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
- [4] [日]山口一郎：《孙文的“大亚洲主义”和“亚洲大同盟”》，选自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3集，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85年。
- [5] [日]野泽丰：《关于孙文在北上途中所发表之言论——以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讲演为中心》，《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 [6] 李勤：《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即卖国主义》，《大连轻工业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 [7] 陈锡祺：《孙中山与日本》，《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 [8] 黄德发：《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问题平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 [9] 赵军：《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
- [10] 陈锡祺：《孙中山亚洲观论纲》，《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 [11] 张翠娥、孙石煌：《试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 [12] 段云章：《1923年后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 [13] 张学俊：《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理论》，《唐都学刊》，1994年第1期。
- [14] 高纲博文：《孙中山的日中苏合作论的历史背景》，《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年第5期。
- [15] 史潮：《试论汪精卫集团投降主义理论之发展》，《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 [16] 周兴樑：《孙中山复兴亚洲思想略论》，《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年第5期。
- [17] 吴剑杰：《从大亚洲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略论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 [18] [韩]裴京汉：《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 [19] 吴仪：《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时代意义》，《“孙中山北伐与梧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
- [20] 大卫·巴雷特著、单富粮译：《英国外交档案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及汪政权的部分历史档案文件》，《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 [21] 张军民：《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学术研究》，2002年第10期。
- [22] 石源华：《汪伪政府“收回”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述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 [23] 任浩：《孙中山的大亚洲思想》，《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 [24] 李本义：《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
- [25] 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 [26] 谢晓鹏：《汪伪的“新国民运动”探析》，《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 [27] 张殿兴：《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 [28] 桑兵：《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
- [29] 陈鹏飞：《中日两国亚洲主义思潮的主流学派之比较》，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 [30] 雷黛鸽：《汪伪政权的三民主义论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 [31] 李晓晨：《〈东亚联盟〉杂志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 [32] 王俏蕊：《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 [33] 村田雄二郎著、宋舒扬译：《孙中山之后的大亚洲主义：民国时期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学研究》，2019年第2期。

致 谢

三年时光，一晃而过，长沙的风，些许微凉，不知何时还能再吹，耳边又响起“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曾以为歌里唱的只是好玩，没曾想过离自己却如此近。又是一年毕业季，感慨万千，还记得自己刚进学校那时候的情景，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站在偌大的教学楼前面，感叹自己未来的日子即将在这个陌生的校园里度过，而如今斗转星移，浮光掠影，又要告别。

三年足以让一个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好像除了年龄增长和日益上扬的发际线，学识和心智并无多大变化，或许是我过于懒惰，或许是我资质太过一般，余老师对我期望较高，而我却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十分惭愧，以至于有时无颜面对老师，与优秀的人比较之后，更加清楚自己的不足之处，需要更加努力并持之以恒的坚持，坚持不一定有用，但还是要坚持，还记得上次自由读书会，我写给自己的话“平凡但不甘平庸，迷茫但内心坚定”。在书院的三年，幸得余老师指导，我虽进步较小，且多次未达到期望，但耳濡目染之下，幸得一些人生思考和学问指点，我虽不是有才之人，但走在了培养健全而完整人格的道路上，做一个善良，不偏不倚，对历史和文化心怀温情与敬意，亦不为一大幸事。

此外，非常感谢书院的各位老师，在书院的三年，既是获取新知，更是培养完整人格和净化心灵的过程，书院老师的热情和负责，让我受益颇多，再次感恩！

在书院的三年，接触最多和交流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师门，每周一次的体育活动，每两周一次的读书会，感谢余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感谢同门薛宸宇师姐、温锦芳、向锦华、李慧敏、廖夏韵、周子楹、贺智妮、谭苏萍、梁媛及韩政委、郝鸿杰、万乾益、朱钊沅、马昇、董佳祺的关心与帮助，特别感谢政委师弟，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各位同门的才识，让我印象深刻，受益良多。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一直支持和鼓励我求学，学生生涯暂告一段落，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加努力并持之以恒的坚持，不辜负父母之养及老师之恩！